



SIFT/LIB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7年第8期 总第20期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7 年第 8 期 • 总第 20 期)

顾问: 叶兴国 李邦君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谢丹迎 王群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谢 蓉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东亚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风险.....	1
1-10 月我国贸易增长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5
11 月政策速览.....	10
11 月国际观察.....	15

二、金融动态

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	19
《货币战争》的两大谬误“货币战争”子虚乌有.....	27
汇率波动的经济原理和超经济原理.....	31
次级债危机溯源.....	32

三、商务英语动态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征文通告.....	35
Motivation and Strategies to Learn English: The Case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36

四、法学动态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51
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答记者问——新外商投资目录开放领域扩大.....	55
经济法——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法.....	56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修改的有关法律问题.....	59
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65

五、高教动态

教育部 人事部 劳动保障部关于积极做好 2008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67
赵沁平出席首届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发展论坛并讲话.....	69
李卫红出席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研讨会并讲话.....	70
大学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关系.....	71
防止“近亲繁殖”武汉一高校招聘教师请校外专家把关.....	74
高校青年教师博士化削弱本科教育.....	75
毕业生求职有了“德育简历”如实记录获奖情况.....	75
专家剖析大学流行语 校园里“寄托”、“崩盘”另有含义.....	76
如何逐步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	77
如何培养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	79
美国高校德育的架构及其影响.....	81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7 年 12 月

第 8 期[总第二十期]

本期要目

- 东亚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风险
- 1-10 月我国贸易增长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11 月政策速览
- 11 月国际观察

东亚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风险

[内容提要]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东亚区域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式。这是由于东亚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特定的地缘目标而缔结双边 FTA，双边 FTA 因其对国内政治的冲击最小并且能够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发展迅速。然而，东亚双边 FTA 的发展将有可能形成 FTA 的轮轴模式，它将增加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并将产生对多边自由化的抵触，同时也会给东亚权力结构带来风险，使东亚一体化更加举步维艰。因而，东亚各国应统合其国家利益，达成区域合作共识，以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排除双边 FTA 可能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双边协定，轮轴模式，东亚一体化，权力结构

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中，作为东亚一体化的总体框架——“10+3”合作举步维艰，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却是目前东亚区域制度安排的主要发展方向。无疑，各经济体双边的贸易合作密切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双边 FTA 的发展对东亚地缘政治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能否最终引致东亚整体的一体化进程，这是理论上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原因

双边 FTA 是东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显著特点。如果从经济学逻辑出发，双边 FTA 理应增进福利效应。然而，国内外许多研究发

现，在双边 FTA 中存在一种“反比例关系”：经济收益最大的 FTA 也是政治可能性最小的，而收益较小的却容易达成合作。典型的例子如中国与东盟的 FTA，它的福利效应低于中国与日、韩任何形式的 FTA。如果一项双边 FTA 协议给一国仅带来低福利，那么很难从经济效应上验证其一体化战略的理性。因此，东亚双边 FTA 的发展应是各国兼顾经济贸易、国内政治、外交及国家安全等多重目标的结果。从整体上看，结合东亚特殊的地缘环境，各国双边 FTA 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为实现本国特定的地缘政治经济目标，选择对象国缔结 FTA。选择 FTA 的谈判对象和确定其优先顺序，是一国重要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各国从缓解国内压力、实现优势互补和追求政治经济利益等多种角度出发选择谈判对象。其中，各国可以利用市场和资本作诱饵，实现非经济目标。特别是大国的经济优势地位赋予了政治与外交上更多的筹码，可以更为自由地选择合作对象。这种现象在东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上得以彰显。

冷战后美国维持并加强了美日同盟这一东亚战略的核心支柱，同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着手与东亚各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此阻止和淡化东亚一体化的不可遏止之势。美国将东亚 FTA 的缔结对象锁定于小国之上，利用双边 FTA 的构建对东亚国家个个



击破,以拆解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这些小国在冷战时期曾经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成员,与美国的关系良好,有利于达成协议。如美国除了已经与新加坡完成 FFA 的签署之外,泰国也是其协商对象,而与韩国的相关谈判也已排入计划中。

日本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故其积极推进 WTO 多边贸易体制。然而,在欧盟东扩和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发展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也开始组建 FTA 战略,并成为东亚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日本的 FTA 战略与其经济大国的身份和政治大国的目标是相吻合的。在日本外务省 2002 年 10 月制定的《日本 FTA 战略》中,日本将选择主要谈判对象的原则定位于“同时考虑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既着眼于经济稳定和未来的经济关系,又考虑改善和加强政治关系、实现区域稳定的可能性”。由此,日本 FFA 战略的重点,是在日新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以韩国和东盟为中心,在东亚和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同时,为了牵制中国发挥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日本于中国与东盟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第二天,即同东盟签署了 10 年内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联合宣言”。这显示出日本对东亚一体化的主导作用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的心态。

中国把东亚作为重要的外交平台,在无法突破中日关系困境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了东盟作为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并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这符合中国以下的外交战略目标:第一,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年会,逐步提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对南海等领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威胁论”的不实宣传效应。第二,推动多极化发展。为了抑制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日益膨胀的单边主义,中国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因此,中国通过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以非对抗性方式在周边地区逐步限制美国影响力的扩张,这避免了东盟国家因地位弱化而向美国或日本靠拢,从而逐步改变东亚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风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

水涨船高。第三,有利于特定经济目标的实现。中国在与东盟、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 FTA 缔约中,把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地位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因为中国在加入 WTO 的头 15 年内面临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问题,而欧美都对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制定了不同寻常的高标准。因而中国不得不采取“逐个击破、多国承认”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贸易伙伴国认可中国的这一要求。然而,尽管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等国之间的 FTA,但由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认知,故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整套明确的、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双边 FTA 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因而,必须尽快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区域战略。

第二,双边 FTA 对国内政治如特定利益集团的冲击最小。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对 FTA 合作对象的选择也必须权衡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多边贸易谈判因市场规模大、涉及领域广、经济利益纷争剧烈等原因而使国内各利益集团受影响程度深,因而多边 FTA 的缔结难度大。相对而言,双边 FTA 因涉及的领域相对狭窄,对国内政治及特定的利益集团冲击最小而容易达成。如日本与新加坡的《日本新加坡新时代伙伴协定》(JSEPA)因不涉及日本敏感的农业部门而顺利缔结;韩国选择智利作为 FTA 的第一个谈判对象,部分原因是由于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初衷是以关税的削减来发展工业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但各国都在特定产业上给予例外,如马来西亚拒绝将汽车进口关税降至规定水平,菲律宾宣布不会降低石化等产业的关税等等。这些双边 FTA 因其对国内政治的冲击较小而能够顺利达成,这使得许多国家 FTA 的缔结都存在“先易后难”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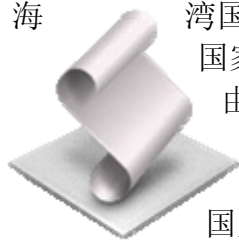
第三,贸易伙伴国同其他国家建立 FTA 所带来的国际压力,使 FTA 的发展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或者深化会因进口壁垒的减少而产生贸易和投资从非成员国向成员国转移,这实际上





是对非成员国的一种歧视。而这种结果会降低非成员国国内出口商的利益，他们也会加紧推动本国同相关国家建立 FTA，或者直接参加 FTA。这就导致了两种结果：或者是扩大了已有的 FTA 成员国的数量，或者是从未参与 FTA 合作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新的 FTA 协议。由此，FTA 接连发生，并最终会形成少数大国争相组建 FTA 的局面。各个分散的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逐渐向核心贸易集团靠拢。例如，美洲地区合作中就存在极为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FTA 首先在美加两国间形成，后来扩大至墨西哥，组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随后，南美洲的智利、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等国家也相继同美国谈判建立双边 FTA。由此，FTA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美国成为美洲地区 FTA 的重心。

东亚双边 FTA 兴起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 年 APEC 吉隆坡会议受挫和 1999 年 WTO “西雅图回合”谈判未果而终，使东亚各国对贸易合作的关注焦点从多边自由化目标转向双边自由贸易上。由此，东亚以日本和新加坡为先导，开始了双边 FTA 的进程。日本自从完成了由单纯重视 WTO 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 FTA 关系的战略转变后，成为东亚 FTA 行动的先导力量。不但签订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而且也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 FTA 研究与磋商。中国在加入 WTO 后，也迅速地开始了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达成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开展双边经贸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已与智利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东



海湾国家、南非和印度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等商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总之，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开端，中国已进入亚太及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自由贸易

区的活跃时期。由此可见，FTA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东亚已见成效。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双边 FTA 的缔结并非以两国的总体福利效应为初始目标，而是兼顾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区域平衡与安全的多重目标的结果，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发展迅速。由于非经济目标被纳入到大国的一体化战略之中，这使区域合作共识难以达成，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和权力结构的影响也将充满变数。

双边 FTA 的轮轴模式及其对自由化进程的负面效应

在东亚区域内多个双边 FTA 的交叉联系中，一种类似于“轮轴模式” (hub-and-spoke) 的特殊力量对比结构将有可能产生。轮轴结构是多个双边 FTA 中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对比结构。它通常存在于以下情形：假设有三个国家，A、B、C，A 国与 B 和 C 国签订单独协定，但 B 和 C 国间没有签署协定。则 A 国是轴国，B 和 C 国是轮国。小规模的经济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通常愿意与大规模的经济体进行 FTA 谈判，因而极易成为轮国。而规模足够大的经济体也有强烈的激励去担当轴国角色并支配区域内众多辅助经济体。一种非对称性依赖的结构就会出现于轮轴模式中。由于 FTA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个国家分别与一个贸易大国签订 FTA 时，则重心逐渐向贸易大国靠拢，轮轴结构极为明显。轮轴模式是一种非对称 FTA 结构，一旦形成，它将具有两方面的负面效应：

首先，多个双边协定存在“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增加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多边自由化进程。“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是指不同的贸易对象国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协定，而众多的双边协定会增加贸易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 FTA 协定具有复杂的原产地规则的协定，各个 FTA 协定之间都不相一致。这就会扰乱货物流动，设置壁垒，引起摩擦，减少灵活性并推高价格。FTA 协定越多，协定覆盖的范围越大，将不同的协定合并在一



起就会更加困难。因而,双边协议的不断增多可能会阻碍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进程。

其次,轮轴模式的非对称性依赖将产生对多边自由化的抵触。轮轴模式是一种利益对比有利于轴国的失衡模式。在以轴国为中心的区域,它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因此轴国更愿意保持现有的模式,而没有激励去进行与多个轮国的多边自由化谈判。而对于轮国来讲,轴国市场对其吸引力更大更重要,同时它不但并没有激励与其他轮国进行自由贸易的谈判,而且还反对新成员的加入。

由此可见,轮轴机制实际上是对多边自由化的抵触,而不会像人们所幻想的那样,多个双边 FTA 会向多边 FTA 自然过渡。因而,东亚双边 FTA 的发展并非如各国所预测的那样,会简单地、直接地过渡到整个区域的一体化和多边自由化。相反,各国组建双边 FTA 的行动可能还会延迟整个东亚的一体化进程。

双边 FTA 的轮轴模式对东亚权力结构的风险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随着双边 FTA 不断扩展,轮轴模式出现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东亚出现了 FTA 的轴国,则对东亚权力结构会产生重大影响,加剧东亚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具体分析如下:

1. 若形成中日两轴国,则将加剧中日紧张关系

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大国,也是“天然”的轴国。两国的 GDP 占东亚的 83%,人口占东亚的 70%。中国本身还是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相当于美国的 5 倍、日本的 10 倍。并且在已有的 FTA 中,中日已分别与东盟等区域内外的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签署或谈判各个不同的 FTA 协议。东盟虽然在地区一体化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它不可能作为轴国,这是由于:第一,东盟自身的自由贸易区进程缓慢;第二,东盟的经济总量与中日两国有天壤之别;第三,东盟内的一些

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等,分别与美日等国签署或谈判 FTA,这阻碍了其自身的一体化进程,使其整合的力量更加分散。因此,随着中日两国积极地融入东亚双边 FTA 的建设进程中,两国很有可能充当东亚的轴国。特别是在未来 10~15 年中,如果东亚各国政府没有区域整合的政治意愿以及有效措施,则东亚地区的双边 FTA 会进一步发展,极有可能形成 FTA 的轮轴结构。

一旦中日同时作为东亚的轴国,而且彼此之间不能突破政治障碍而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则这种模式将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竞争。尽管目前中日之间基于互补性的合作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形成了贸易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但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技术与资源、技术与劳动力的静态模式,更不会加强双方的互补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将逐渐突破互补性模式。所以,可以预见的是,中日两国在某些领域的互补性存在递减的趋势,而经济竞争性将逐渐增强。这将使双方都竭力发展 FTA 的合作对象,从而在东亚形成以中日两国为轴国的 FTA 轮轴结构。两国基于经济的互补性而建立起来的密切的经济往来会进一步受到来自保护主义势力及反华政治集团的深刻影响,从而将对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因而轮轴模式的形成将加剧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东亚区域一体化也会受其影响而难有更大的突破。

2. 美国将利用与东亚国家建立双边 FTA 进一步阻止东亚一体化进程

二战后,由于受到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困扰,东亚缺乏共同的安全机制和社会基础,普遍认可了美国在东亚霸权的存在。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也千方百计去阻止东亚自身的一体化进程,打造有利于自身的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为此,美国竭力发挥平衡作用。这体现在塑造东亚地区内的多个双边关系上,比如两岸关系、中日关系以及日韩关系。在各种双边关系中,美国充当外来平衡器的角色,造成双边关系的“斗而





不破”的格局。通过微妙的平衡，使两方对美国都有依赖，营造出其霸权无法退出的局面，从而牢牢掌控东亚局势的发展。

东亚多个双边 FTA 趋势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通过与东亚各国签订 FTA 协议，美国能够强化与缔约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增强对缔约国的影响力，进而根据自身意愿塑造东亚地缘政治。为此，美国积极地与东亚各国特别是冷战时期的传统盟友签订双边 FTA，从而可以针对东亚国家个个击破，最终消解东亚一体化趋势。而美国最为担心的是由中日两国联合主导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中日两国如果达成了类似法德式的和解，那么东亚一体化将如同欧洲一样会进入快速轨道。然而，如若东亚双边 FTA 形成了以中日两国为轴国、其他经济体为轮国的轮轴模式，则会加剧两国间的竞争性和紧张关系，这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可以不遗余力地发挥平衡作用，形成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东

亚地区力量结构。到那时，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将更是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东亚双边 FTA 是各国兼顾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重目标的结果，也是目前区域实践模式的基本方式。然而，它的发展却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在世界经济出现以美欧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下，如若东亚最终形成以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为主导的格局，那么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东亚国家整体被边缘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东亚各国必须在各自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东亚整体的利益之间、在阶段性的特定目标和世界格局中的长远目标定位之间进行权衡，统合各国的国家利益，达成区域合作共识，以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排除双边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共同致力于东亚一体化进程。

作者：范洪颖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

1-10 月我国贸易增长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10 月份，我国贸易出口额 10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增速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进口额 80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5%，增速比上月大幅上升 9.4 个百分点；10 月份当月贸易顺差高达 270.5 亿美元，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本文分析了最近一段时期的中国进出口数据，认为受部分外部需求放缓、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等因素影响，贸易顺差仍将维持在高位，但增速有可能放缓。

一、前 10 月中国进出口情况

1-10 月我国外贸出口 9858.4 亿美元，增长 26.5%，比 1-9 月份减缓 0.6 个百分点；进口 7734.8 亿美元，增长 19.8%，比前 9 个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其中，10 月当月出口达 9858.4 亿美元，增长 26.5%；进口 7734.8 亿美元，增长 19.8%。受进口增速加快影响，1-10 月贸易顺差为 212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比 1-9 月的顺差增幅减缓 10.2 个百分点。

1、出口增速逐渐回落

10 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22.3%，增速较 9 月的 22.8% 和 8 月的 22.7% 有所减缓，其中，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速的下降是影响目前我国出口增速出现回落的重要原因。

1-10 月机电产品出口 5622.4 亿美元，增长 27.9%，比 1-9 月份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2778 亿美元，增长 24.8%，增幅与 1-9 月份持平。1-10 月份，传统大宗商品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956 亿美元，增长 22.9%，比 1-9 月份放慢 0.1 个百分点；鞋类 210.3 亿美元，增长 16.1%，比 1-9 月份放慢 0.7 个百分点；塑料制品 120 亿美元，增长 9.2%，比 1-9





月份放慢 0.8 个百分点；箱包 88.6 亿美元，增长 23.4%，比 1-9 月份放慢 0.3 个百分点。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速回落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放慢。此外，钢材出口受宏观调控影响继续回落，1-10 月我国钢材出口 5376 万吨，增长 63.8%，比 1-9 月份放慢 9.5 个百分点，比去年年底增速大幅降低 46.2 个百分点。10 月份当月中国出口钢材 424 万吨，较上月减少 20 万吨，环比减少 4.5%；净出口钢 339 万吨，环比下降 3.97%，创今年以来钢净出口新低。钢材出口的持续下降，主要基于今年以来陆续出台的出口调控政策逐步生效。加之近期欧盟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负面影响，导致国内对欧盟的钢材出口连续数月下滑。

2. 进口增速有所加快

10 月份，我国进口同比增长 25.5%，与 9 月的 16.1% 和 8 月的 20% 相比有明显提高，也是今年 3 月以来进口增速首次超过出口增速。受此影响，10 月，贸易顺差同比提高 13.65% 至 270.5 亿美元，远远落后于 9 月 56.3% 的同比增长。其中，初级产品进口增速反弹是导致 10 月份进口提速的重要原因。

1-10 月，初级产品进口同比增长 24.7% 至 1935.6 亿美元，增幅超过了 1-9 月的 22.4%。其中，铁矿石进口同比增长 16.6%，比 1-9 月的 14.9% 高出 1.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豆进口同比增长 4.5%，增幅超过了 1-9 月的 2.1% 和 1-8 月的 1.8%。铜矿石和精炼铜进口同比增长 29.0%，增速超过 1-9 月的 26.8%。

同期，我国进口工业制成品 5799.2 亿美元，增长 18.3%，比 1-9 月份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 75%。其中进口机电产品 4042.7 亿美元，增长 16.5%，机电产品中的汽车进口 24.4 万辆，增长 36.9%，增幅均超过前三季度水平。10 月进口增速出现反弹，与初级产品、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关系密切。其中，初级产品进口增速上升明显，对 1-10 月进口增速上升贡献 0.57 个百分点（1-10 月进口增速比前三季度上升 0.7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82%。原油价格的上涨也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增速上升较快。占比达 33% 的原油在进口量增速略有上升的情况下，其进口额却大幅增长 13.2%，比前三季度提高 2.7 个百分点。

3. 加工贸易比重持续降低

1-10 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7831.6 亿美元，增长 28.6%，加工贸易进出口 7965.3 亿美元，增长 18.5%。一般贸易中，出口 439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8%，比前 9 个月放慢 1.2 个百分点；进口 3439.2 亿美元，增长 25.8%，比前 9 个月加快 1.2 个百分点。

单月来看，10 月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7.8%，比上月加快 4.3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0.2%，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受到国际原油和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在一般贸易中，10 月出口同比增长 20.9%，比上月下降 4.9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 38.2%，比上月大幅上升 17.5 个百分点。

自去年 3 月份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增速开始超过加工贸易，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比重不断扩大，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贸易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不断降低。这一趋势反映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进口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出口产品层次逐渐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二、贸易顺差仍将高企，增速或将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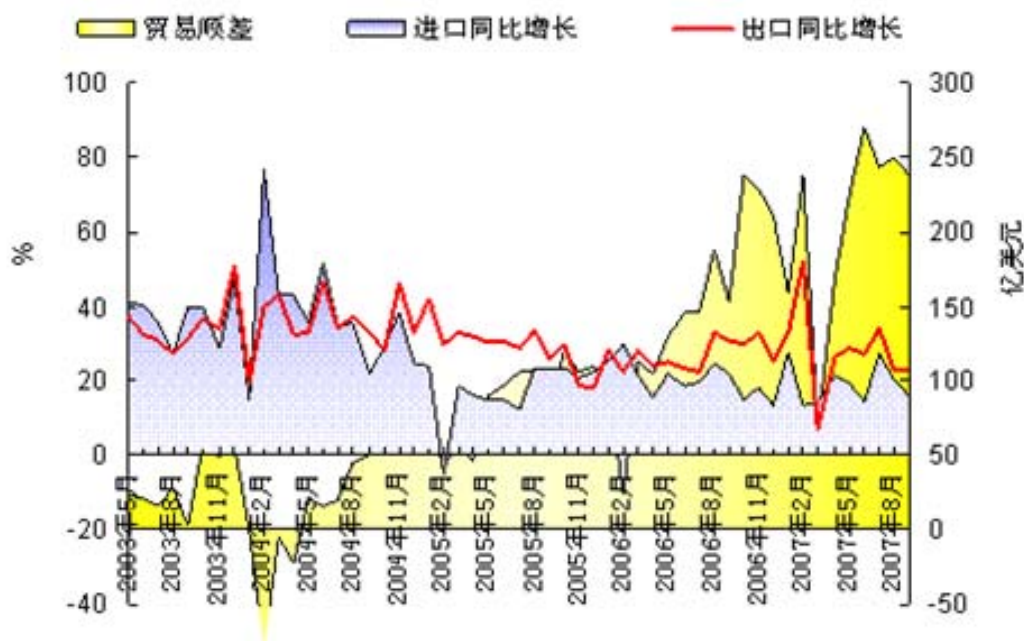


1-10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593.2亿美元,同比增长23.5%,进出口规模接近去年全年水平。贸易顺差达到2123.6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1775亿美元的顺差水平,鉴于出口增速回落的态势有可能持续,未来贸易顺差增速或将逐渐放缓。

1. 贸易顺差持续高位徘徊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在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位次上升至第三位之后,2005年和2006年一直稳居第三。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2002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7.2%。2003年-200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连续四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29.8%,其中出口增长31.3%,进口增长28%,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2007年,中国进出口增长继续延续,1-10月,我国贸易顺差2123.6亿美元,前10个月的累积贸易顺差已经相当于2006年的全年的120%,以2007年全年中国对外贸易23%的水平计算,到2007年底,中国进出口总额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图1: 国内贸易增长情况 单位: %, 亿美元



2. 资源性产品出口回落影响顺差增速

自从国家今年7月1日起取消或调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将部分商品由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的政策实施以来,效果已初步显现,出口增幅开始出现回落。海关统计显示,政策调整涉及商品总体出口增幅回落。1-9月政策调整涉及商品出口值占同期全国出口总值的36.1%。9月份政策调整涉及商品出口同比增长21.4%,比前8个月增幅减缓9.1个百分点。调低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出口增长放缓,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出口下降。9月份调低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出口增幅比前8个月放缓7.4个百分点;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出口同比下降6.3%,政策调控效果明显。在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中,资源性产品出口增速普遍放缓。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整体仍将维持顺差存量高位运行,顺差增速不断下降的格局。

图2: 03年至今贸易顺差单月增长情况 单位: %,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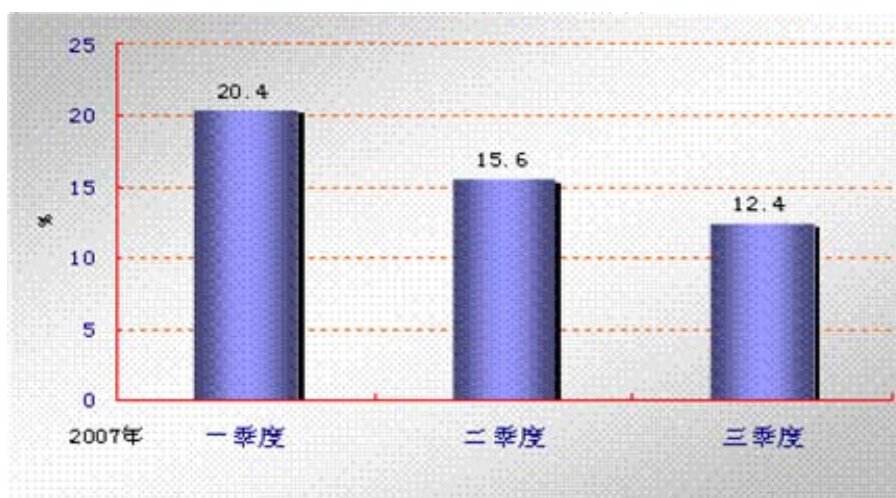


三、影响贸易增速的主要因素分析

1. 美国等国的进口需求下降或导致中国出口放缓

2007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不断回落,由3月底的20.4%迅速下滑为10月末的15.7%,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月度增速也因此呈现不断下降态势。同期,美国先行指标和消费者信心显示美国经济可能进一步走弱,房地产市场依旧是经济最大的拖累因素。1-9月,美国住宅投资环比大幅下降20.1%,拖累同期经济增长10.5个百分点。并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其它方面,最近几个月美国制造业不断降温,房地产开发的减少致使建筑原材料及机械产品等制造企业减产,住宅需求的减少也导致房屋装修及耐用品等消费需求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靠信贷支持消费的美国家庭而言,房价下跌所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减少和信贷市场紧缩都对美国家庭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图3: 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 单位: %





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构成中,机械电子产品约占45%,主要是白家电和黑家电,纺织品占15%,美国经济放缓,将影响中国对其上述产品的出口。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国,美国消费需求的减少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情况,预估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下降的态势仍将延缓,美经济趋缓将从外部需求角度对我国未来出口增长构成向下压力。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经济下滑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的进口增速放慢也将影响未来我国出口速度。

2. 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顺差增长的减速作用

0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走势平稳,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却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尤其是07年的5-9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明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2007年8、9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屡创新高,分别达到98.69和100,升值速度有所加快,比年初实现累计升值6.17%。尽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速度加快受到美元疲软的影响,使得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走高,但同期欧元、英镑等货币也在走强,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整体走势平稳。与此同时,近期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持续高企,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环比上涨0.3%,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通胀压力的持续增加了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可能,加息预期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加大中国企业商品出口的压力,受此影响,未来中国出口可能有所放缓。

3. 国内要素价格重估使出口型企业成本逐渐上升

我国生产要素,如资金(利率)、土地、资源、环境等一直被严重低估,使资源、能源要素含量高的产品价格较之国际市场偏低,这也是众多出口型企业对中国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加工业和制造业向我国转移,使得能源、矿产、土地、水等资源需求剧增,较低的资源价格,刺激了对资源产品需求的不合理膨胀,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导致了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为改变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按市场机制定价将逐渐成为我国资源要素产品改革的重要方向。

目前国内关于资源品价格改革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或正在酝酿,同时过去长期实行的外汇额度补贴、出口贷款利息补贴、出口优惠利率、出口退税、内外资企业差别所得税税率等措施将逐渐取消,成本要素的提升、美日经济下滑、外部需求减少,都将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挑战。

4. 针对高能耗产品出口的宏观调控效果将在未来数月进一步显现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层面加紧了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生产领域的管理,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进行了大幅下调,导致相关产品出口增速放缓,并进而影响国内工业增加值的小幅回落。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9%,较9月份增速回落1个百分点,主要是与出口增速放缓有关。其中,工业企业共实现出口交货值6571亿元,同比增长18.5%,与8、9月份相比均有很大降低,主要是针对钢材、塑料等产品出口的调控效果已经显现,虽然如此,但由于节能减排的目标依然艰巨,国家有可能会继续出台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出口企业的相关管理规定,因此,不排除未来紧缩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出口进一步回落的可能。

四、结论

1. 今年以来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偏快





2005 年以来,经济增长结构有所改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均衡状况出现明显改善,投资贡献率出现下降,消费贡献度增长平稳,而外需的贡献度上升较快,在经济发展结构出现改善的同时,外需的过快增长使得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增大。

今年 1-9 月份消费、投资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7.0%、41.6%与 21.4%。与 2006 年相比,消费贡献率下降 1.8 个百分点,投资略升 0.2 个百分点,而外需提高 1.6 个百分点。由于消费增长较慢,外需的过快增长必会使得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及经济摩擦加大。

2. 外汇占款增多推升货币投放加快

外需的过快增长、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必然带来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1-9 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出现大幅增长,共增加 3673 亿美元,同比多增 1983 亿美元,贸易顺差高企导致的外汇占款增加是货币供给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10 月份中国广义货币(M2)供给量同比增速 18.47%,与上个月基本持平,依然处于过快的高位;M1 增速 22.2%,比上月略高;10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361 亿元,绝对数量比 9 月份降低 1400 多亿,但增速依然保持在 17%以上的高位。在中国目前资本项目管制下,贸易顺差的高企和持续流入的海外资本使得央行被动投放过多的货币供应量来保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升值压力与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也因此应运而生。鉴于由商业银行的主动信贷创造功能使得更多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有可能演变为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性过剩,11 月份,央行明确表示会“加大对冲力度”,将以组合拳的形式使用数量型紧缩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进一步的上调空间,使用特别国债、央行进行对冲的力度也会比前期有所加大。

3. 出口放缓或有助于降低通胀预期

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创新高,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形势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走高,我国实际消费出现连续下降,1-9 月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 06 年明显下降 1.8 个百分点,通胀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支出及实际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未来出口继续维持温和放缓的走势,部分外销产品有可能转向国内,产品供给格局的改变有助于价格弹性的恢复,从而抑制国内目前高企的通胀。由于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高位运行的态势仍将持续,通胀因素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总体看,通胀因素有可能促使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高位,助推人民币升值。

综上所述,今年以来,国内贸易在保持高盈余的基础上,增速有逐渐放慢的迹象,预计受外部增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国内贸易增长将温和放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增强。

来源: [国研专稿]

11 月 政策 速 览

国务院重拳收紧新开工项目

11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7〕64 号,下称“64 号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于新开工项目的管理,从明年开始,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拟建项目将被要求建立管理档案。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依法加强和





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切实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开工建设关,维护投资建设秩序。

通知共分5个部分,分别是:严格规范投资项目新开工条件;建立新开工项目管理联动机制;加强新开工项目统计和信息管理;强化新开工项目的监督检查;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

通知要求,各类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必须符合已经完成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土地供应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8个条件。

根据《通知》,各级统计部门要切实做好新开工项目统计工作,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在信息互通制度的基础上,为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拟建项目建立管理档案,包括项目基本情况、有关手续办理情况(文件名称和文号)等内容,定期向上级发展改革部门报送项目信息。在项目完成各项审批和许可手续后,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将项目名称、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各项审批和许可文件的名称和文号等情况,通过本单位的门户网站及其他方式,从2008年1月起按月向社会公告。

《通知》同时指出,各类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必须满足已经按照规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并已经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分级审批的规定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条件。

点评: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44号)文件下发之后,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银监会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投资〔2006〕1538号),要求各地对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此次新的通知则要求在日常管理中明确跟踪5000万元以上项目,进一步扩大了新开工项目的监测范围,同时以建立日常长效信息监测的手段来加强管理。

整个通知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手段的一部分,目前来看,难以抑制的投资冲动依然是整个经济过热发展的源头,因此,最近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都指向抑制投资,发改委自去年4月起,连续推出10余项针对具体行业的调控措施。今年还多次出台措施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及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而央行则也连续加息以及提高准备金率以缩小流动性过剩。

但是,自去年政府对于新开工项目的清理之后,投资增速依然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中国的新开工项目19.1万个,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3万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6.9%,由此推算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幅超过30%,为年内最高水平。

新开工项目只不过是造成投资增长的表面原因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还没有完全转型的情况下,GDP考核依然是政府考核的主要依据,地方官员招商建设冲动依然强烈,而固定资产投资仍旧能得到高收益以及高回报,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调控手段似乎很难起到明确的效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防过热防通胀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协调发展,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坚持“好字优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要坚持改革开放,力争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推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更大成效,把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特别是要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众生活。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良好势头;继续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出更大成效;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重要商品生产、供应和市场调控,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完善消费环境,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发展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能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支持欠发达地区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卫生、住房保障等制度建设,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协调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深化企业、财税、金融、价格、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会议强调,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很重,要把握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切实把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努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两部委: 外资投资产业新指导目录面世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11月7日联合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下称《新目录》),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业限制范围有所扩大,对金融业限制尺度有所放宽。

这份将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目录》明确表示,我国将继续限制外商投资于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经营,外商投资土地成片开发则必须与内资企业合资、合作;并新增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或经纪公司的限制。此外,还将“普通住宅地开发建设”从现行《目录》(2004年修订)的鼓励投资类别中删除。

在金融业领域,《新目录》规定,寿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证券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且仅限于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49%;期货公司需由中方控股。与现行目录相比,限制尺度均有所放宽。其中,期货公司由原来的禁止投资类修订为限制投资类。

在制造业领域,《新目录》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等产业;在服务业领域,《新目录》增加“承接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内容,并减少原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在环保领域,《新目录》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鼓励外商投资资源综合利用。而对一些国内已经掌握成熟技术、具备较强生产能力的传统制造业不再鼓励外商投资,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条目适用于外商投资项目。





同时,对我国稀缺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新目录》不再鼓励外商投资;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也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此外,大豆和油菜籽食用油脂加工、生物液体燃料生产要求由中方控股,玉米深加工则被列入限制类目录。

针对我国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等新形势,《新目录》不再继续实施单纯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也持谨慎开放的态度,适当调整相关条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配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此次修订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不再列入仅“限于中西部地区”的条目。凡属于需鼓励外商投资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将在下一步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指导目录》时统筹考虑列入。

发改委: 国家将从四方面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国家发展改革委11月29日表示,国家将从完善政策环境、培育市场主体、鼓励企业依法经营、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等四方面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

一是完善政策环境。这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强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的市场主体地位。就政府来说,要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更加规范的程序和有效服务,从国情出发,制定相关规划和产业国别导向政策,使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互衔接,同时也通过对对外投资的指导协调,防止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恶性竞争。

二是注重培养“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政府需要在金融、外汇等方面完善政策,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发展跨国经营。从规模上讲,国家既鼓励大型企业走出去,同时也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开展对外投资。

三是政府要求企业依法经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包括保障当地员工的合法权益和当地投资伙伴的合法利益。中国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时,应注重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并支持当地社会民生事业。这样,通过走出去,既拓展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税收。

四是在政府间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政府间的双边、多边投资合作促进机制,与相关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张晓强说,目前我国已经与11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希望以后能签署更多的协定,以及在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检验检疫等方面的政府协定,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点评: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出投资领域、投资方式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良好趋势,但与“引进来”的规模与经验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还处于初步阶段。因此,国家需要在各个方面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发改委明令严禁引进新建落后产能





发改委日前专门下发《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把关，坚决制止落后装备设施外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坚决禁止引进和新建落后生产能力。

决定明确规定，对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一律不得进口、转移、生产、销售、使用和采用，不得转移落后生产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在推进淘汰落后工作的进程中，要彻底废毁落后装备和设施。各级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淘汰的主体装备设施处理方式和去向，对将淘汰的落后主体装备作为生产设备自行出售、转让，形成落后生产能力外流的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

通知强调，各地在招商引资、新建工业生产项目过程中，要遵循国务院相关要求，严把准入关口，坚决防止以招商引资、产业转移等形式新增落后生产能力。通知明确表示，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及其他相关规定的新建项目，投资主管部门不予核准和备案，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对引进、接纳、新建落后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的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停产、关闭，并追究业主及地方管理部门责任。

通知还指出，各地相关部门对采用二手装备新建和改造扩建生产线的项目要进行重点审核，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要求，以及不能达到部门和地方相关标准的工艺装备、生产线，坚决不予核准。

点评：目前一些已淘汰或拟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装备正在成为部分地区和企业的招商目标。这些地区和企业拟引进、接纳和使用被淘汰的工艺装备在本地重建生产线。这一作法将在不同地区增加新的落后产能，再次产生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源，形成落后生产能力的转移和流动，严重干扰和破坏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进程。对此，各地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

商务部：126项技术禁止和限制引入进口

商务部11月2日发布了《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列入了进口后将危害国家安全、影响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影响人和动植物生命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技术126项。

该目录是在2001年12月颁布的《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第一批)》的基础上，综合了国务院各部委、各行业协会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修订建议，经百余名技术和贸易专家多次评审，并由环保部门和中国工程院专家审定后确定的。

修订后的目录细化了控制要点和技术规格，更加规范化，更具操作性，所列的被禁进口、被限制进口的技术涵盖了农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冶炼加工业、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及环境管理业等19个行业。

点评：限制盲目进口，引导企业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推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是本次目录发布的一大目的。限制类、鼓励类进口产品目录的发布将完善我国外贸政策，不仅有利于缓解外贸顺差，也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进我国技术的创新发展。

来源：国研网





联合国：全球就业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

11月 国际 观察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11 月 28 日发布《2007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就业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的现象，如何确保人们享有体面工作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

报告指出，1996 年至 2006 年间，全球劳动力增加了 16.6%，达到 29 亿人，全球经济以每年 3.8% 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失业率从 6% 增长到 6.3%，达到 1.95 亿人，出现了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同步现象。

报告指出，全球许多地方的就业和工作出现了非正式化趋势，短期合同普遍，工人缺乏权利意识，缺乏安全保障。同时，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进行重组，以普及化和免费或高度补贴为基础的公共卫生保健服务正在减少；各国的卫生保健体系由于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费用上涨以及艾滋病的冲击，承受着巨大压力；残疾津贴和失业保险福利的门槛在提高；养老金体系也前途未卜。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呼吁各国政府不应仅重视经济增长或单纯追求创造工作机会，而应把就业和确保人们享有体面工作作为发展战略中心。

东非共同体 5 国与欧盟签署一份新贸易框架协议

东非共同体 5 国与欧盟 11 月 27 日签署了一份新的贸易框架协议，以取代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科托努协定》。

来自坦桑尼亚、卢旺达与乌干达 3 国主管贸易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以及肯尼亚和布隆迪驻乌干达大使分别代表 5 国政府与欧盟驻乌干达大使以及东非共同体的代表签署了该框架协议。

根据这份将于明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协议，除食糖和大米外，欧盟将向东非共同体 5 国完全开放市场，且无关税及配额限制。与此同时，东非共同体 5 国也须在 25 年内逐步向欧盟完全开放市场。按照协议，15 年后欧盟出口到该地区 80% 的产品将获得免关税待遇。

双方还同意就达成新的《经济伙伴协议》继续谈判，并于 2009 年 7 月前实现这一目标。

欧盟目前正与 70 多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组成的非加太集团就新阶段《经济伙伴协议》加紧谈判，以取代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科托努协定》。除了东非共同体 5 国外，欧盟 11 月 23 日还与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 4 个南部非洲国家签署了类似的贸易框架协议。

世行：非洲经济发展逐步赶上世界步伐

世界银行 11 月 14 日发布的《2007 年非洲发展指数》报告指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在 1995 至 2005 年期间取得明显增长，已经赶上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鼓励创新并加强机构能力建设，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更加快速而稳定的增长。





报告指出,1995年至2005年间非洲整体经济表现与1945年至1985年间的经济崩溃或1985年至1995年间的经济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2005年,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增长率为30.8%,而津巴布韦则出现负增长。

报告指出,非洲国家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洲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其人口占整个非洲的27.7%;第二类国家至少保持了4%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人口占非洲总人口的35.6%;第三类国家自然资源匮乏、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滞后,其人口占非洲总人口的36.7%。

报告指出,非洲经济比其他任何区域都更具有波动性,避免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大幅下降对于非洲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扩大出口并使出口商品多元化是减少波动性、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消除对经济增长制约也非常重要。

世行:东亚经济明年仍会强劲增长



世界银行11月14日在华盛顿发表报告说,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油价上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东亚经济在2008年仍可能保持强劲增长,但增速会略微放慢。

这份报告指出,虽然东亚对美国的出口已经有所减缓,但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使经济得以保持强劲扩张。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今年为11.3%,明年也可达10.8%。而这种增长动力将延伸到中等收入的东南亚经济体,并推动其经济增长。

不过,报告也警告说,处于历史高位的国际油价将考验2008年东亚以及全球经济扩张步伐的稳健程度。

报告还指出,贫困如今已经变成一个相当严重的农村问题。在很多东亚经济体,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扩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这些经济体的政府正在实行旨在缩小城乡差别政策,重新将重点放到农村和农业发展上,开拓加强人力资本开发途径。

报告说经济快速增长是东亚地区减贫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保持这种增长仍很关键,为此,继续改善投资环境、金融系统、公共服务、教育和革新制度,依然是这个地区很多经济体的优先重点。

欧委会调低未来两年经济增长预测

欧盟委员会11月9日调低了欧盟和欧元区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受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和油价上涨拖累,欧元区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正在增加。

欧盟委员会当天公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显示,欧盟和欧元区经济明后两年将会明显减速。其中,欧盟经济增长率明后两年预计都将为2.4%,低于今年的2.9%,而欧元区明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由今年的2.6%分别降至2.2%和2.1%。

尽管欧元区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增加,但欧盟委员会认为,欧元区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固,尤其是消费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得益于就业形势持续改善,预计个人消费仍会保持旺盛势头。此外,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的增长,也为欧元区经济保持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点评: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造成信贷紧缩, 并对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 从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抑制欧元区投资增长。

美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及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是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不利因素。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会降低美国对欧元区产品的需求, 从而对欧元区的出口不利。此外, 美国经济增长放慢还会进一步推动欧元对美元升值, 从而给欧元区的出口带来全面压力。

此外, 国际市场油价不断攀升也是欧元区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风险。最近两个月, 纽约市场油价屡创新高。受油价飙升和食品涨价影响, 今年 10 月份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升至 2.6%, 是自 2005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欧盟委员会估计, 欧元区通胀率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仍会保持在高位。

东盟: 2015 年前实现经济一体化

第 13 届东盟首脑会议、第三届东亚峰会等东盟系列峰会在新加坡举行。此次东盟系列峰会的主题为“一个位于活力亚洲中心的东盟”。系列峰会上将签署《东盟宪章》、《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以及有关气候变化、环境与能源等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其中, 东盟 10 国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盟宪章》是东盟系列峰会的最大关注点。

此外, 随着最近几年全球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重视, 作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区域组织, 东盟也不例外。据了解, 在此次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东盟签署《东盟环境可持续性宣言》、《东盟关于气候变化的宣言》等文件, 而在第三届东亚峰会上, 东盟 10 国领导人将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六国领导人一起签署《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的新加坡宣言》。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 东盟也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步伐。今年 1 月, 东盟 10 国领导人决定将实现东盟共同体的目标从原定的 2020 年提前至 2015 年, 而东盟经济共同体则是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中最为重要的一大支柱。

今年 8 月下旬, 第三十九届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在马尼拉召开, 东盟经济部长们批准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最后草案文本。为到 2015 年实现货物、服务、投资、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蓝图总体规划了东盟今后 7 年内应采取的措施, 包括将电子、卫生、汽车等作为一体化的 12 个优先行业, 加强政府与企业界等的伙伴互动关系, 加快与对话伙伴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等。据了解, 此次东盟首脑会议将审议并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蓝图计划 2015 年前建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包括几大目标: 建立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以及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经济区, 实现经济公平发展, 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

美联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11 月 20 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10 月 30-31 日会议纪要。纪要显示, 会议期间, 美联储决策者下调了对美经济增长的预期; 并认为此次降息不会对通货膨胀预期造成负面影响。

尽管会议纪要称, 10 月 31 日的降息决定是一个进退维谷的抉择, 但有经济界人士认为, 如果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恶化、市场持续处于困境, 美联储会再度放松货币政策。金融市场





也持相同预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联邦基金期货价格表明,市场预计,美联储于12月11日再度降息0.25个百分点的几率约为90%;并有67%的可能在1月30日进一步采取类似举措。

会议纪要还显示,联邦公开委员会还将对核心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从此前的1.75%-2%调低至1.7%至1.9%。并认为此次降息不会对通货膨胀问题造成负面影响。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通货膨胀问题可能还未充分显现。很多出口企业为了继续在美国这一重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尚未提高出口价格,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消化由于美国经济形势和美元贬值等所带来的成本的上升和利润空间的下降。但若美国经济持续疲软、美元持续走低,出口商可能将最终无法自行消化成本的上升,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

点评: 美联储的预期基本与市场一致。我们认为,对美国经济保持适度的谨慎是合适的,尽管美国经济在三季度表现出了强劲的气势。

同时,次级债问题的产生以及相伴随的信用紧缩,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将使得人们的支出紧缩,消费不足。这一现象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而在信用紧缩和支出下降的双重冲击下,住房市场疲软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尽管有观点认为,非住宅房产才更具决定性,但是在消费支出和未来预期不明确情况下,住宅市场疲软的影响力不能低估。

弱势美元“外部性”危及世界经济

作为世界公认“硬通货”的美元正在迅速失去强势货币的耀眼光环,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会受到怎样影响?对于深陷次级债风波的美国本身而言,弱势美元的内部影响更显正面。但从外部影响来看,弱势美元可能对国际金融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更显负面的深远作用。



首先,弱势美元带来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度紊乱。国际商品市场波动呈现出与美元币值变化的高度相关性,在美元指数创出新低的11月6日,黄金价格上升至814.83美元/盎司,这一本世纪新高较2001年创下的本世纪低点上涨了221%。同日,原油价格也高居95.10美元/桶的高位。国际货币体系紊乱迫使各国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并给投机活动升温创造了机会。

其次,弱势美元带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弱化预期。相比美国实体经济在次级债风波中的中长期受损,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势头依旧良好,但受累于本币汇率相对美元的快速升值,这种经济周期的国别错配会趋向弱化,全球经济增长路径受汇率市场过度波动的不确定性影响将有所下调。就在美元指数创下新低的11月6日,欧元兑美元走上1.4531的本世纪新高点,较2000年的本世纪低点升值了76.56%,在收获“货币新贵”虚名的同时,刚刚走出基础结构调整长期阴影的欧元区经济在出口萎缩的影响下面临着重返颓势的尴尬。

最后,弱势美元带来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恶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美国人用美元消费以美元标价的各国商品,以美元计算本土投资收益,美元贬值显然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中性事件”。但美元资产的海外持有者却实实在在受到了汇率变化带来的投资损失,如此背景下,美元资产减持成为一种时尚,8月日本和中国就分别减持了其4.1%和2.2%的美国国债,减持速度均创下5年新高,同期外部持有者还净卖出了12.42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债和406.37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减持比率高达129.63%和291.50%。美元资产减持进一步加剧了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致使资产价格飙升难以抑制,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

来源: 国研网



SIF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7 年 12 月

第 8 期 [总第二十期]

- 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
- 《货币战争》的两大谬误 “货币战争”子虚乌有
- 汇率波动的经济原理和超经济原理
- 次级债危机溯源

案例分析**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

作者：王洛林 余永定 李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日期：2007-12-14

进入 1997 年以来，由于看好香港回归的政治经济前景，香港股市一路暴涨。外资大量涌入香港股市，外国投机者也大量借入港币购买港股。现在来看，在香港回归前后，港股价格连续大幅度上升在很大成度上由外国投机资本涌入造成的。在此期间，只要港股价格上升幅度超过 6%（超过美元利息率），投机者就已赚到了钱。1997 年 8 月 7 日，香港恒生指数涨到 16673 点的历史最高位。同 4 月份的 12075 点相比，仅仅四个月股市就上涨了 38%。其中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更是从 7 月 3 日的 996 点上升到 8 月 25 日的 1727 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竟上升了 73.39%。此时的香港股市早已孕育着爆跌的危险。

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金融危机突然爆发。随后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亚洲“龙舌兰酒”效应，外国资本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近期经济前景突然看淡。为了保证在股市上赚到的钱在汇出时不会因港币贬值而遭受损失，外国投资者（以及投机者）在开始外汇远期市场上出售港币。与此同时，对港币本身的投机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本来一直相当稳定的港币远期汇率从 1997 年 7 月起开始下跌。港币远期汇率对现货汇率的贴水率明显增加。香港股市从 8 月底开始出现剧烈动荡，当时人们已普遍认为，年内香港股市将会跌破 12000 点。10 月初，台湾当局放弃一直坚守的 28.48 元新台币兑换 1 美元的汇率。10 月 21 日新台币跌到 30.7 元兑换 1 美元。以新台币贬值为契机，金融风暴祸水东移。10 月 22 日投机者开始全线出击，大举沽空港股和港汇。长线投资者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信心发生动摇。为了避免损失他们慌忙抛售港元、港股。承盘银行也被迫卖出港元进行对冲。由于投机者、承盘银行和长线投资者都在抛售港元，港币汇率在现货和远期市场受到强大压力。港币汇率直逼 7.75 港币兑换 1 美元的底线，一年期远期汇率则下降到 8.02 港元兑换 1 美元。

由于外汇市场上港币抛售压力巨增和香港金融管理局所采取的紧缩银根措施，香港银行间拆借市场利息率急剧上升，且一度上升到 300%。由于利息率的急剧上升，在 1997 年 10 月 23 日香港恒生股票指数由 11700 点爆跌至 10600 点，跌幅 10.4%。次日股票价格出现反弹。但在 10 月 28 日恒指再次大幅下跌，跌至 9069 点。若以香港股票市场 7 月 3 日的 2000 亿美元市值计算，到 10 月 28 日，已只剩下 1000 亿美元，损失约 1000 亿美元。红筹市值在同一时期内由 450 亿美元跌至 190 亿美元，损失 260 亿美元。在外汇市





场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则成功地捍卫了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到 10 月 29 日港币汇价不但没有下降,反倒从危机前的 7.7 港元兑换 1 美元的“底线”上升到 7.73 港元兑换 1 美元。投机者开始在外汇即期市场买进港币以套取高息,同时也对港股逢低吸纳。金融风波终于暂时平息。到目前为止,恒生股指在 10000 点至 12000 点之间波动;港币对美元的汇率则基本稳定在危机前的水平。分析家认为,香港的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还要看香港的各种利息率是否能够回落到正常水平而不引起新一轮风波。香港特区政府在股灾发生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国际金融界的普遍好评。

到目前为止,内地对香港股灾的经过已进行过详尽的报道。但是,对于股灾发生过程中各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因果链条,特别是以联系汇率制度为基本特征的香港金融体系是如何对国际投机风潮作出反应的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还有一些不甚了了之处。本文力图根据国际金融的有关理论和在香港进行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对股灾发生的过程作出具体的经济解释并澄清有关香港股灾的一些模糊认识。

发钞局制度

在一般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特别是在不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固定汇率是靠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经常性干预来维持的。当本币汇率低于事先确定的汇率变动下限时,中央银行就外汇市场上投放外币买进本币;当本币汇率低于事先确定的汇率变动上限时,中央银行就外汇市场上投放本币买进外币。此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从而增加本币资产吸引力的办法来维持固定汇率。香港所实行的汇率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是以所谓发钞局制度为基础的。“发钞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同一般的固定汇率制度不同,实行发钞局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要求本国(区)货币同美元(或某种国际储备货币)保持固定比率,而且要求本国【(区)】现钞的发行要有百分之百的美元【(或某种国际储备货币)】准备。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比索同美元保持 1 美元兑换 1 比索的固定汇率;同时,阿根廷银行每新发行 1 比索现钞必须有 1 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作为准备金。

“套戥”(arbitrage)

同一般的汇率制度不同,在以发钞局制度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下,给定的固定汇率(不是给定的汇率变动范围)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维持,而不需要中央银行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在发钞局制度下,给定固定汇率是通过银行和公众的套戥(内地一般译做套利)活动实现的。套戥又分为套汇和套利两个方面。在我们这里,前者是指利用汇差获利后者是指利用利差获利。以港币为例,如果在外汇市场上,港币对美元的汇价是 8 港元兑换 1 美元,根据贱买贵卖的原则,套戥者(arbitrageurs)将会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港币。例如,用 1 百万美元买进 8 百万港元。然后,他们将按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固定汇率把这 8 百万港元卖给香港金融当局以换回 1.0256 百万美元,从而赚取 2.56% 的收益。只要外汇市场上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低于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官方汇率,套戥过程就会继续进行下去。另一方面,套戥的进行意味着外汇市场上对港元需求的增加。在外汇市场上港元汇率将随对港元需求的增加而回升。当外汇市场上港元对美元的汇率恢复到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官方汇率时,套戥活动就将自动停止。反之,如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过高,反方向的套戥活动就会出现,直至外汇市场上港元对美元的汇率恢复到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官方汇率。在上例中,我们并未考虑套汇者把港币源源卖给香港金融当局会对利息率有何影响。事实上,套戥者把港币卖给金管局意味着货币市场上货币供应的减少。而这又将导致银行间拆借利息率及其他相关利息率的上升。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套戥者【也】将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港币。同套戥者的套汇活动相似,套利活动也将导致外汇市场港币汇率趋于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给定固定汇率。

联系汇率制度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同一般的以发钞局制度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后简称发钞局制度)又有所不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发钞局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同一般的发钞局制度相比,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在香港现钞是由三大发钞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的。在实行发钞局制度的其他国家(地区),现钞由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发行。换言之,香港实行的是一种没有发钞局的发钞局制度。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币进入和退出流通是在两个层次上实现的。首先,三大发钞行可以按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官方汇率直接同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的货币当局）下的外汇基金从事外汇买卖。发钞行向在外汇基金缴付存入美元后即可取得负债证书（ICs）并按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比率发行港币。负债证书是发行港币的授权书，记入发钞行的资产方。发钞行把负债证书退还给外汇基金后就可按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比率得到美元，而相应的港币就将退出流通。其他银行不能同香港金融管理局直接进行交易。其次，一般银行可以按 1 美元兑换 7.8 港币的比率把美元存入发钞行或把等量的港元存款转入发钞行，从而从发钞行得到所需港币。它们若从事反向操作，港币就将退出流通。在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下，实际存在着两个外汇市场：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和一般公众与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前者涉及外汇基金和发钞行之间以及发钞行和其他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后者涉及发钞行和一般公众以及其他银行和一般公众之间的外汇交易。香港的外汇市场汇率是指后在一市场上由外汇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汇率。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香港没有准备金制度，而实行发钞局制度的国家一般都有准备金制度。在有准备金制度的情况下，按固定汇率与美元兑换的不仅仅是现钞而且是所有基础货币。

一般认为，由于一般公众不能参与套汇，而发钞行和其他银行出于交易成本和其他种种考虑又不愿从事套汇活动。此外，当香港利息率上升时，银行由于担心汇率风险也不愿买进港币以从事套利活动。因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典型发钞局制度所具有的自动维持固定汇率的功能。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外汇市场上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 1 美元兑换 7.8 港元之下的强势水平。尽管在理论上存在通过套汇获利的机会，套汇活动却没有发生。由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并未充分发挥理论上的自动维持固定汇率的作用，早在几年前一些香港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对联系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使套汇活动充分发挥作用的建议。在这次香港股灾之后，香港经济学家更是提出了改革联系汇率制度的种种方案。

投机者的投机战略和操作过程

为了更好了解国际投机者是如何对香港进行攻击的，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外国投机者对一种货币进行投机的操作过程有所了解。

攻击一种货币的最简单办法是在外汇即期市场上沽空该种货币。即如果投机者预期一种货币将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对美元贬值或可迫使其对美元贬值，他们便先借入该种货币，然后再在外汇即期市场上按当前汇率卖出这种货币买进美元。若这种货币果真贬值，投机者就可以按较低汇率（即用较少美元）买回这种货币以还贷并支付利息。还本付息后所剩余的美元即构成投机收益。如果预期的货币贬值没有发生，投机者就会因必须支付贷款利息而遭受损失。通过外汇即期市场进行投机的首要问题是投机者从那里取得投机对象国的货币？一般来说，投机者主要可以从三个来源取得投机所需的货币：1 投机对象国的国内货币市场；2 国际金融市场；3 抛售对象国的股票和债券。投机者通过上述途径取得投机对象国货币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对象国资本自由化的程度和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泰国的资本自由化程度相当高。同时，在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上又很容易得到泰铢。这就使泰国很难抵御外国投机者在泰国外汇即期市场上对泰铢进行投机。在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投机者获得泰铢。例如，泰国货币当局限制在外汇即期市场上对非居民出售泰铢；限制外国持有人在泰国证券交易所出售股票换取泰铢等。与此相对比，香港的资本自由化程度很高，但港币的国际化程度却不很高。投机者难于在香港以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港币，而必须主要从香港境内的金融市场借入港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货币当局较容易察觉国际投机者的动向，并及时采取措施以阻止外国投机者得到港币。

如果难以得到投机对象国的货币因而无法直接在外汇即期市场沽空该种货币，投机者可能采取的另一办法是在远期货币市场上发起攻击。投机者在远期货币市场上出售所攻击货币的远期合约，如果在远期合约期满时该种货币贬值，投机者就可获利。例如，在不考虑利差的情况下，投机者按 7.76 港元兑换 1 美元的远期汇率出售 3 个月期的 100 亿港元远期合约。如果 3 个月后的即期汇率下跌到 7.9 港元兑换 1 美元，投机者用 12.6582 美元从外汇即期市场买进 100 亿港元履约，可以获利 2284 万美元。同利用即期市场进行投机相比，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从出售远期合约到履约的期间内（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一年等）投机者无须买进或借入所抛空的货币。这种投机虽然可以说是无本万利但风险也极高。例如，如果三个月后的即期汇率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 7.5 港币兑换 1 美元，投机者就可能必须在





即期市场上用 13.33 亿美元买入 100 亿港元以履行合约。其结果是损失 4467 万美元。专业投机者往往会同时订立成千的履约期不同的远期合约。虽然他们并不能正确预测每一履约日的即期汇率,但只要预测的基本方向正确,他们就能获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未来即期汇率预测(即当初的远期汇率)发生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必将被未来即期汇率预测正确(即合约成交时的即期汇率低于当初市场所预期的未来即期汇率)所带来的利润所抵消。在泰国金融危机初期,外国投机者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向泰国大量沽空泰铢远期合约。

根据抛补利息平价(covers interest parity)理论,在平衡状态,一种货币的远期汇率对其即期汇率的贴(升)水率等于该种货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的利差。换言之,当一种货币的远期汇率对即期汇率的贴水率等于该种货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的利差时,在外汇即期和远期市场之间不会有套戥活动。例如,假设港币的即期汇率和一年期的远期汇率分别是 7.75 港元兑换 1 美元和 7.7866 港元兑换 1 美元;香港和伦敦的同业拆借利息率分别是 6.5%和 6%。由于利差约等于港币远期汇率对即期汇率的贴水率(0.5%),可以证明,无论套戥者是在即期市场买进港币、在远期市场卖出港币抑或反之,都不会得到额外的收益。假设套戥者用 10 万美元在即期市场上买进 77.5 万港元后将其投放在香港的货币市场,同时在远期市场上卖出 82.5375 万港元。一年后,套戥者从 77.5 万港元投资中收回本息 82.5375 万港元。在履行远期合约时套戥者在支付 82.5375 港元后得到 10.599 万美元。10 万美元的美元资产本来就可以提供 0.6 万美元的利息。套戥活动并没有给套戥者带来额外收益。同样,假设套戥者用 77.5 万港元在即期市场上买进 10 万美元后将其投放在欧洲货币市场,同时在远期市场上买进 82.537 万港元。一年后,套戥者从 10 万美元投资中得到 10.6 万美元。履行远期合约时套戥者在支付 10.6 万美元后得到 82.537 万港元,以港元计套戥者获利 5.037 万港元。77.5 万港元本来就可以给投资者带来 5.037 万港元的利息(利息率 6.5%)。套戥活动也没有给套戥者带来额外收益。既然如此,套戥活动就将不会发生,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以及利息率也不会发生变化。

投机者在外汇远期市场大量抛售远期合约,将导致远期汇率下跌。根据抛补利息平价理论,一种货币远期汇率下跌必将导致该货币利息率的上升或(和)即期市场上汇率的下降。从某种平衡状态出发,如果远期汇率下跌,套戥者就可能按以下顺序采取行动:(1)从国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借入本币;(2)在外汇即期市场上抛售本币买进美元;(3)在伦敦欧洲货币市场上将美元贷出;(4)在从国内同业拆借市场借入本币的同时买进本币的远期合约;(5)用在欧洲货币市场贷放期满的美元履行购买本币的远期合约。远期汇率较处于平衡状态时为低意味着用较少美元既可买到用于履约的本币。套戥者履约后所余之美元即为套戥利润。由于存在套戥的空间,套戥者将不断从货币市场借入本币,然后再到外汇即期市场抛售本币。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同业拆借市场上对本币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同业拆借利息率的上升;在外汇市场上对美元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币即期汇率的下降。例如,假设港币的即期汇率仍是 7.75 港元兑换 1 美元,香港和伦敦的同业拆借利息率仍然分别是 6.5%和 6%;但由于远期市场上的抛售压力,一年期的港币远期汇率由 7.7866 港元兑换 1 美元的均衡远期汇率下跌到 7.9 港元兑换 1 美元。套戥者可从货币市场借入 775 万港元并在即期市场上将其转换为 100 万美元。与此同时,套戥者还将购买 825 万港元的远期合约。一年后,套戥者将得到 106 百万美元,其中的 104 百万美元被用于履行远期合约。这样,在偿还港元贷款本息之后,套戥者可得到 2 万美元的利润。由于可以得到利润,套戥者将不断地从货币市场上借入港元、在外汇即期市场上抛售港币购买美元。香港同业拆借市场利息率将会上升,港币的即期汇率将会下降,直至套戥利润消失。

投机者大量沽空投机对象国货币远期合约将对该货币的远期汇率造成下跌的巨大压力。远期汇率下降的趋势必将引起正常投资者的恐慌,为了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大批投资者将通过出售该国货币的远期合约的方式进行对冲。这就造成了远期汇率的进一步下跌。当前货币远期汇率的下降将导致当前即期汇率的下降,而那些早已沽空该货币远期合约并应在当前履约的投机者将因此而获利。

另一方面,即期市场上本币汇率的下跌或(和)利息率的上升则将导致远期合约价格的下降。例如,如





果本国货币市场利息率上升,套戥者将在外汇市场抛售外币买进本币并将其在国内货币市场贷出。与此同时,套戥者还将出售本币远期合约。结果,本币的远期汇率将会下降。同样,即期市场上本币汇率的下降也将导致本币远期汇率的下降。

面对远期市场上本币贬值的压力,货币当局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例如,在外汇远期市场上进行反向操作买进远期合约、提高货币市场利息率和在即期市场上买进本币等。例如,在金融危机初期,泰国中央银行对远期外汇市场进行了广泛干预,大量买进泰铢远期合约以维持泰铢的稳定。到 1997 年 8 月份,泰国为履约而必须在未来 12 个月中动用的外汇储备高达 234 亿美元,但当时泰国的外汇储备只有 304 亿美元。与泰国不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则专心固守 7.8 港币兑换 1 美元的联系汇率,一般不对外汇远期市场直接进行干预。在远期汇率下降的情况下,以捍卫即期汇率为目标的金融当局的传统做法是:在货币市场实行紧缩、提高利息率以消除套戥空间,从而抑制即期汇率的下降。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提高利息率将导致远期汇率的新一轮下降和投机的加剧。

一种更为复杂的投机方法是先在投机对象国的证券市场沽空该国的债券、股票或股票期货,然后再在外汇远期市场上沽空该种货币。远期汇率下跌将通过套戥活动而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和(或)即期汇率的下跌。在固定汇率下,为了维持即期市场上的固定汇率目标,货币当局可能还会紧缩银根从而进一步导致利息率的上升。总之,不管原因如何,投机者在外汇远期市场的卖空操作必将导致投机对象国利息率的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又意味着投机对象国债券和股票价格的下跌。由于投机者早已事先沽空了该国的股票、股票期货和债券,股票、股票期货和债券价格的实际下跌将使投机者在证券市场获利。

在实际的投机过程中,上述种种方法经常是混在一起的。当投机风潮出现的时候,除在证券市场沽空股票、股票期货和债券,然后再在外汇远期市场上沽空对象国货币外,投机者还同时在外汇即期市场沽空该种货币。这样,如果投机者在外汇远期市场和即期市场沽空货币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迫使投机对象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使货币贬值,投机者就可在外汇市场获利。另一方面,面对在外汇远期市场和即期市场的巨大抛售压力,尽管投机对象国保卫固定汇率取得成功,该国利息率上升所导致的股票、股票期货和债券的价格下降必将使投机者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利。这样,如果投机者在证券的即期和期货市场以及外汇的即期和远期市场全线出击,他们就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双赢”局面:如果受到攻击的国家和地区最终贬值或放弃固定汇率制,投机者就将同时在证券市场 and 外汇市场获利;如果固定汇率未被攻破,投机者就一定能在证券市场上获利。投机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取得用于投机的货币和其他金融工具所支付的利息等。从理论上说,如果固定汇率并未被攻破,投机者在证券市场的获利不一定能抵消在外汇市场的损失。但投机者凭借其强大的金融实力和投机对象国自己为他们提供的各种可资利用的金融工具,他们往往能稳操胜券。即便在最难以取胜的香港,投机者在股票市场上的获利也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外汇市场的损失。尘埃落定,用港人的话来说,他们早已“饱食远 yang”

自 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香港就一直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之中。可以说,香港居民一直在等待着一场难以避免的金融风暴的到来。在香港股灾爆发之前,许多香港金融机构就已对国际投机者对港币发动攻击(港人把这叫做“狙击”)所可能采取的策略和办法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后来到来的金融风暴更是早已作好了如何应对的周密准备。

对冲者

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投机者兴风作浪,是造成东亚货币爆跌的元凶。但对冲者(hedgers)或译避险者的对冲活动(hedging)也对东亚货币的爆跌起到了重要作用。投机者在证券即期和期货市场、外汇即期、期货和远期市场沽空一种货币是为了投机,而对冲者的类似操作则是为了避险。然而,在一场金融危机中,对冲活动将大大加深金融动荡的幅度。7 月 2 日泰铢贬值后,一天之内泰铢在国内外汇市场和离岸市场分别下跌了 14%和 19%。泰铢的贬值幅度之所以大大超过泰国中央银行的预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料到外债负担沉重的泰国公司会如此不顾一切地在即期市场上抛出泰铢买进美元以进行对冲。

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该国或地区的汇率比较稳定,利用外汇期货和远期合约避险一般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该国或地区的货币突然贬值,那些需要把本币换成外币的人就会严重损失。





为了避免因本币出乎意料的贬值而遭受损失,人们往往要外汇期货和远期市场抛售本币。例如,三个月后一香港厂商需偿还 10 万美元的债务。如港币贬值,该厂商的以港元计的债务就会增加。如三个月后美元-港元汇率由当前远期外汇市场上的 1: 7.8 变成 1: 9,本来 78 万港元的债务就变成了 90 万港元。为了避免汇率变动所造成的风险,香港厂商可以在外汇远期市场上沽空港元,即签定一个出售 78 万港币的三个月期的远期合约。设三个月后港币贬值到 1 美元兑换 9 港币,该厂商的债务以港元计由 78 万港元增加到 90 万元。然而,由于意外的贬值,三个月后按远期合约以 78 万港元买到的 10 万美元,在即期市场上可换回 90 万港元。这样多付的 12 万港元债务恰好被远期市场上的 12 万港元赢利所抵消。可以验证,不管 3 个月后港元汇率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作了对冲,厂商就可以避免汇率变动所能带来的意外损失。当一国货币出现贬值危险的时候,厂商的大量对冲活动必将使外汇远期市场上的形势大大恶化。

在外汇市场上港币银行承盘银行也是对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投机者沽空远期港币的活动相对应,银行是远期港币的主要买主。买入远期港币意味着银行将在今后(如 3 个月后)得到一笔港币,但要支付一笔相应的美元。这样,在银行的收入与支付表(Receipts and Payments)上就出现了币种的不匹配。3 个月后如果港币贬值,银行就会出现损失。此外,期限(maturity)的不匹配也会使银行遭受损失。为了避免损失,银行往往要进行复杂的涉及货币即期、远期和掉期的对冲操作,以便使收入与支付表上的币种和期限实现匹配。例如,在买进投机者卖出的远期港币合约之后,承盘银行通常立即在外汇即期市场上卖出等量港币、买进相应美元,并在两天后交割。显然承盘银行的对冲活动将增加本币在即期市场上的贬值压力。

在 1997 年 5 月前,香港远期汇率对即期汇率的贴水率很低。一年期的远期汇率在 7.8 港元兑换 1 美元以下。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港币远期汇率明显下跌。到 1997 年 8 月港币对美元的汇率已下降到 8 港元兑换 1 美元以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外,就是因为正常投资者由于对联系汇率制度的信心发生动摇而开始利用外汇远期市场进行对冲。而这又为投机者对港币远期市场施加压力以便实现“双赢”战略提供了绝好帮助。因此为了迫使港币在远期市场大幅下跌,投机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恐慌情绪,以动摇人们对联系汇率制度的信心,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对冲者的行列。投机的力量加上对冲的力量就很可能使一种货币同时在远期和即期市场上一泻千里。本意在于避险的对冲操作对货币稳定的巨大破坏作用是造成东南亚国家货币在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后溃不成军,而香港金融当局决不言放弃联系汇率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恒生期指和【备兑】认股权证

投机者对香港进行投机时可使用的金融工具主要有港币远期合约、恒生期指、外汇基金票据(Exchange Fund Bills and Notes)以及港币和股票现货等。在这次香港股灾之中,恒生期指起了重要作用。恒生期指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简称。所谓期货合约是指买卖双方同业在某一时间内或某一特定时间以预先达成的价格去买卖某种物品。这种期货物品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股票、股市指数、外汇和债券等金融工具。恒生期指所代表的期货物品是恒生指数。恒生期指合约不需要在特定日期交割。如某人买入一张 9 月份的期指,他可以在 9 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前一天之前的任何一天平仓。每张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价格为恒生指数期货价格(即恒生股票指数的点数)乘以港币 50 元。假设恒指期货成交为 10,000 点,则合约的价格为 500,000 港元。设一个人在 12 月 1 日沽出一手点数为 10,000 点的一月份恒指合约;在 12 月 2 日由于市场看淡股票市场的前景,一月份恒指点数下降到 9,000 点。如果此人在 12 月 2 日平仓,他就可获利 50,000 港元(=50 港元乘以 10,000-9,000)。

在 1997 年 10 月 20 日恒指的点数为 12860;第二天、第三天恒指的点数分别为 11700 和 10600;一周后(10 月 28 日)恒指跌到 9069。从 10 月 22 日到 10 月 23 日的一日之内恒指下跌了 1100 点。如果投机者在 10 月 22 日沽空 60,000 张恒生期指,以每点 50 港元计,一天内他就能赢利 33 亿港元(约合 4 亿 2 千 6 百万美元)。对应于 12860 点,一张恒指合约的价值是 64,300 港元。出售这张合约应交按金(押金)60,000 港元,成本杠杆比率为 10.72。杠杆回报率高达 101%。在从 10 月 20 日到 10 月 8 日的一周内,恒指下降 3791 点,投机者可赢利 114 亿港元(约合 15 亿美元);一周的杠杆回报率更是高达 316%。

投机者在实施双赢战略时,既可沽空股票现货也可沽空股票期货。但是在大规模沽空股票现货时,股





票价格将会迅速下跌。因而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股票还没在较高价位售出之前，股票价格早已大幅下跌。这样，即使投机成功获利也会大大减少。沽空股票期指由于可以迅速大量出货则可避免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衍生金融工具，由于恒指的成本杠杆比率为 10.72，1 亿港元的资金可以产生 11 亿港元的投机效果。因而恒指成为投机者在香港股市兴风作浪的最主要工具。

在香港股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另一衍生金融工具是【备兑】认股权证（Warrant）。【备兑】认股权证是一种期权合约；是发行商【（一般是投资银行）】赋予持有者在规定时间内、按一定价格从发行商购买股票的权利的证明文件。发售【备兑】认股权证可以使发行商筹得额外资金。购买【备兑】认股权证使购买者有机会以较低价格得到股票。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在认股权证到期时低于认股权证所规定的价格，持证者将放弃凭证购买股票的权利。因为投资者可以以较低在股票现货市场买到所需股票。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在认股权证到期时高于认股权证所规定的价格，持证者将行使认股权利。因为投资者可以以较低价格从发行商买进股票，然后再将股票在股票市场按市价卖出，从而获利。在股票价格上涨期间，越来越多持证者将行使买进股票的权利。为了保证能够履约，发行商必须不断增加所持的股票。当股市大跌的时候，越来越多持证者将不会行使买进股票的权利。发行商必须减仓以减少自身损失。在 1997 年初，投资者看好香港股市，许多投资银行发行了【备兑】认股权证。在 1997 年 10 月底股市爆跌时，香港有 300 多只认股权证挂牌，其中有 44 支认股权证将在 10 月底或 11 月底到期。由于此时有一半以上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发行商被迫减仓至零。这就加速了股市下跌的速度和幅度。

不难看出，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大大加剧了香港股灾的严重程度。

阴谋论（conspiracy）

许多评论家认为，香港股灾的发生完全是国际炒家的阴谋所使然。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负责人和金融界的一些从业人士则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有组织的阴谋。对阴谋论持反对意见的人士的主要论据是，在外汇远期市场沽空港币者与在股票市场上抛售期指和沽空港股者不是同一机构。在双赢战略一节中，我们已指出，投机者为了在股票市场沽空获利，将在外汇远期市场沽空港币以造成利息率的上升。但事实上，对港币的压力似乎同时来自即期市场和远期市场。外汇远期市场上的压力似乎主要来自对冲活动而不是投机者的双赢战略。另一方面，似乎也没有哪个投机者拥有如此巨大的控制力，以至他可以确信：在外汇远期市场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一定能够在今后的某个时刻在股市获利，而不是仅仅为其他投机者创造“搭便车”的机会。阴谋论者则认为，查不出确凿证据，并不能说明没有大户操纵。为了出其不意，投机大户一定会化整为零、把蛛丝马迹掩盖好的。利息率飙升与香港银行同业市场的运作

在 1996 年 10 月 23 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息率曾一度达到 300%。由于股市的爆跌和利息率居高不下。香港经济界的一些人士，对于金管局对危机的处理颇有微词。他们指责金管局只有升息这“一招”。金管局则一再强调，面对投机者对港币的抛售金管局并没有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息率的措施，利息率上升是市场的自动反应而不是金管局的政策所使然。当远期汇率下跌时，由于套戥的结果同业市场利息率将会上升。特别是当即期汇率不变时，利息率的上升幅度将会更大一些。然而，香港同业市场利息率一度飙升到 300%显然已不是抛补利息平价理论所能解释的，甚至也不是非抛补利息平价理论所能解释的。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香港金融体系中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或称港元同业市场）、香港的流动资金机制（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简称为 LAF）和香港的即时全额结算体系（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system，简称为 RTGS）做一简短讨论。

香港的港元同业市场是香港最重要的货币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香港本地认可银行是港元资金的最主要提供者，而外国银行则是港元资金的最主要需求者。通过港元同业市场，大部分一年以内的资金由存款者经零售银行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转到没有分行网络或只有很少分行的海外注册银行，然后在转到最终借款人手中。对于本地银行来说，港元同业市场是短期资金的最好投资场所。中、小银行由于缺乏资金，传统上是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资金需求方，而大银行则是资金的供给方。香港同业市场也是进行外汇（货币）掉期（swap）的重要市场。外汇掉期是外国银行从同业市场取得港元资金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香港的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建立于 1992 年，它相当于一般国家中央银行的贴现窗口。在同业拆借市场





关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这一窗口把结算帐户上的多余资金存入自己在外汇基金开设的帐户,也可以以外汇基金票据和其他有效票据的回购协议的方式通过这一窗口从金管局借出短期资金(隔夜)。总之,香港金管局通过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流动资金调节机制的存贷利率是有由香港金管局决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的存贷利率决定了同业拆借利息率的下限和上限。

香港的即时全额结算体系建立于 1996 年底。根据这个体系,香港的所有持牌银行都必须直接在金融管理局开设结算帐户,并且直接进入这个体系进行相互之间交易的结算。所有银行不得在其结算帐户上进行隔日透支。换言之,在每个交易日结束时,所有银行都必须保证其结算帐户上的结算余额为正值。如果一个银行在大量出借资金之后无法保证其结算余额为正,该银行就必须在同一天在同业市场上或通过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借入港元,以避免隔日透支。在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流动性被定义为所有持牌银行结算帐户上的结算余额的总和。

由于套戥活动,远期汇率下降必然导致货币市场利息率的上升。远期汇率下降是货币市场利息率上升的基本原因。除此之外,同香港金融体系中的上述特殊安排有关的许多因素对香港同业拆借利息率的暴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发钞银行在从外汇市场买进港币后,港币并未重新流入同业市场。作为承盘银行的发钞行在外汇市场买进港币之后有三种选择:(1)将港币转卖给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取得套戥利润;(2)把这些港币留做准备金以增加银行的流动性;(3)把港币贷给其客户或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贷给其他银行。为了稳定港币,金管局并不急于把新买进的港币重新投入银行体系。由于担心贷款的价值因港币贬值而贬值,发钞银行不想把港币贷给其客户或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贷给其他银行。这样,由于从同业拆借市场流出的港币并未流回,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减少。

其次,在正常情况下,结算帐户面临透支危险的银行有三种选择:(1)在外汇即期市场出售美元以取得港币;(2)透过流动资金机制借入港币;(3)从同业市场拆入港币。在发生危机的 10 月 21 日,第一个选择行不通,因为外汇交易必须要等待两个交易日才能实现交割,而银行在当天就需向其结算帐户注入港币。第二个选择会冒被罚息的危险,并给金管局留下有参与投机之嫌的坏印象。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中、小银行无法找到足够资金以应付正常业务,它们可以求助于流动资金机制。然而在 10 月 21 日,当港币跌至 7.75 港元兑换 1 美元的底线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出警告:“重复”利用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借款)的银行将被处以“惩罚性”高息。由于害怕被罚息,资金短缺的中、小银行不敢利用流动资金机制。于是,银行只剩下第三种选择:从同业拆借市场借入所需港币。由于缺乏资金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不顾一切地从同业市场寻找资金。同业拆借市场上需求压力进一步增加。

此外,投机者为了在外汇市场抛售港币,必须从货币市场借入港币。沽空港币的投机者必须为了履约也必须从货币市场借入港币。这些也是造成货币市场上供不应求因而利息率上升的原因。

最后,此外人们还怀疑香港金管局从同业市场借走了(或买走了)大笔港币从而有意推动同业市场利息率的上升。无论事实如何,在理论上,金管局可以酌情使用下述几种方法调节同业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影响拆借利息率:(1)在同业市场上借入或贷出港币;(2)买卖外汇;(3)买卖外汇基金票据;(3)在财政和外汇基金之间转移资金。事实上,通过改变同业市场的流动性来影响拆借利息率的所谓“流动性管理”本来就是金管局的重要日常工作。有些评论家认为,香港金融管理局不应通过收缩银根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而应让联系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在现有情况下,这种论点显然是不现实的。尽管香港外汇储备超过 880 亿美元足以应付所有 M1 兑换成美元。但是如果发生恐慌,香港居民要提取存款并将这些存款兑换成美元,则外汇基金将无法应付。截止 1997 年第二季度末,体现为 M3(M1 加持牌银行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有限持牌银行以及接受存款公司的存款)加掉期的香港货币总量近 1 万 7 千亿港元,相当 2180 亿美元。如果所有货币都要兑换成美元,则外汇储备全部用光也是不够的。

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同业市场的交易量很大,但其日结算余额只有 20 亿港币。因而,同业拆借利息率对同业市场的流动性十分敏感。总之,在 10 月 23 日由于几乎所有银行(可能包括金管局)都在利用同业拆借市场拆出港币,几乎没有银行向同业拆借市场投放港币,同业市场的流动性极度紧张,这就造成了





香港同业拆借利息率的飙升。股灾和香港经济的基本面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会遭到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是因为这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出了问题，“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所谓基本面（fundamentals）并没有什么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1）银行体系是否健全，其中主要是看是否存在大量不良债权等。（2）通货膨胀状况如何，特别是是否存在以资产价格过高为标志的泡沫经济。（3）是否存在大量财政赤字、国债余额对 GDP 之比是否可以接受。（4）是否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外债余额对 GDP 之比是否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之下。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香港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好的。唯一有问题的是香港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偏高。如果香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不是偏高，国际投机者是否就不会冲击香港了呢？答案大概应该是否定的。在国际投机风潮中，“龙舌兰酒”效应或“传染”效应极为巨大。或大或小，或迟或早，国际投资者是要在香港“走一遭”的。基本面好并不能阻止国际投机者的攻击。但基本面的好坏却能决定投机对象国是否能在国际投机浪潮面前成功地保卫本国或本区货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从根本上说，保卫本国本区货币主要有两种方法：动用外汇储备和提高利息率。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保卫港币的过程中没有动用外汇储备而仅仅使用了提高利息率这“一招”——不管是香港金管局主动提高了利息率还是市场机制之使然。但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却不能使用这简单的一招。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基本面的问题比香港严重得多。例如，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政府之所以未能成功地保卫泰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泰国存在严重不良债权，当外国投机者沽空泰铢时，泰国货币当局不敢大幅度提高利息率以遏制和惩罚投机者。因为利息率的大幅度提高必将导致早已为不良债权所困扰的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破产。泰国政府更多的是依靠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然而在外汇储备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干预迟早是要失败的。而这种干预一旦失败，由于其间外汇储备的流失，几十年苦心积累的国民财富就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付之东流。香港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子，由于金融体系健康，不存在不良债权问题，香港经济对高利息的承受能力要比泰国高得多。这样，尽管在股市上遭受了沉重损失，香港货币当局毕竟成功地保卫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香港经济在这次风浪中并未受到致命的伤害。股灾之后，香港的经济泡沫破灭。在一定程度上，坏事已经或正在变成好事。香港的经济前景是光明的。

金融书评

《货币战争》的两大谬误 “货币战争”子虚乌有

作者：胡祖六（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来源：《财经》，2007 年 12 月 03 日

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货币战争》书中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惊讶，甚至不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

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于近 200 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当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





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该书的欣赏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1.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 11110 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

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谬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 19 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 J.P. Morgan 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 J.P. Morgan 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 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





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

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2.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





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 1836 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 20 年就爆发一次,而 1907 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 12 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 12 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

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 FOMC 的成员,占 FOMC 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 FOMC 主席。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 FOMC 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 A 类、B 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 200 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 6% 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 A 类与 B 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 1980 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





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一点上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 30 余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货币战争》一书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 年 12 月 23 日,美国大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 100 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货币战争》,宋鸿兵著,中信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专家观点

汇率波动的经济原理和超经济原理

作者:陈炳才(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金融人才网专家委员会金融专家)

来源:和讯网 2007 年 11 月 27 日

从金融行为学的角度来讲,我谈三个小问题。美元贬值是美元降低利率。近期来看,第一个问题看持久性有多久,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前一个问题的结果,美国降低利率,2002 年到 2005 年出的一个比较低的时期,这种解套必须进行一个循环来解套,如果说赤字扩大的话,这里包括印度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很类似的,应该说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相对货币我认为是升值而不是贬值,危机还是比较大的话,这个可能会带动其他国家货币跟随贬值,可能就不一定是升值了,就像我们的股票一样。我个人认为,赤字债务不会很大,持久也不会很持久,美元在后面,如果还有两次到三次的降低利率,我觉得在这基础上,美元基本上能够稳定。全世界央行是 1 万多个亿,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剥离 2.6 万亿的不良资产,仅仅是一个中国,你算一万个亿对发达来说算什么。所以从这个调度来说,我觉得这个 1 万亿,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第三个问题,资产证券化的危机,这是一个纵向危机,不是一个横向危机,横向危机是一个债务连,纵向危机是只要央行出售了,这个危机就算基本结束。我个人认为,或者说某种意义来讲是收敛性而不是扩散性。第四是房屋贷款的危机,住房贷款的产物不是很长。住房价格我认为随着全世界资源它会逐渐的平稳,不会像过去日本产生的泡沫,这里有一个时间波动。第五我想不要低估了美国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能力,我想象 911 事件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救助能力和救助系统,这个我们都能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是主导地位,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美元真正往下跌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害怕,所以各个银行都会来资助它,所以我想世界其他国家也会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七点我想说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对于通货膨胀,银行危机相对来讲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案例,对于解决资产泡沫以及危机包括不动产和股票,应该说基本上没有成熟和成功的经验,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包括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不对产危机,从解决的途径和方式来说应该是有办法的,当然得讲企业的执行率怎么样,这可能有一个过程。

总的来说,美国赤字危机是一个生物链,美国早期有一段曾经降低利率的时候,他降低利率全世界认为资金会往外走,其实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国际上的资本流动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国家地区最近一年的与其增长,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看好了,有一点,美国的美元贬值因素能够平稳下来不表明其他货币的升值,第二个我想说关于全世界的资源价格上涨,在坐的都搞金融的,贸易这块我就不多讲,在 02 年 03 年我研究世界经济中的石油价格,当时得到的结论是不动产和股票的价格在长的时候,期货是往下跌的,02 年发现了一个变化,不动产往上涨的时候,商品期货也在往上涨。我当时研究黄金价格的时候,是 250 至 260 美元,后来涨到 300 美元,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黄金协会的会长跟他说现在的黄金价格是 500 多,比较低的时候,你们中国应该买,我们说黄金价格 500 多美元,你想一年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一个高位,你现在让我来接盘,我不,你想两年以后又长到怎么样,现在





是涨到 800 多美元,在这次最高点的时候是 850 美元,后来一路降低,现在又往上走,这个趋势我个人认为资源价格是一个长期上行的曲线,当然会有波动。我个人认为,我们看看 02 年的金融市场规模的变化发生了一个跳跃性的变化,我讲货币都是由中央银行创造的,现在不是了,有企业创造的,有行业创造的,包括现在银行发银行卡,票据这些都是货币,你现在钱多了,实物资产没有增加,或者说增加的很慢,这钱肯定会上涨,包括石油价格,所有人都拿着很多的货币很多的钱,他干什么,我资源那么多,不就太高资源价格他干什么,所以无论从我们的战略还是从什么方面我们对这个问题都要有一个认识,现在就是钱攻,所有人都在创造货币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是人民币的汇率,在未来的两年到三年因此是趋向升值,,这个升值的原因是现在的所有的货币兑美元都在升值,如果相对低的货币就会引人注目;发达国家在用各种手段压人民币升值,刚才周老师也讲了很多的例子,商务部说了我们未来五年,能超过美国,你想想美国是贸易逆差,你要知道我们是贸易顺差,被人家看,被人家要求升值,这就是我们跟美国的区别。要从中国的升值原因来讲,我们知道 1996 年到 2003 年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是低的,我们 05 年升值的时候,最低是 10%到 15%,但是我们实际只有 2%,而且 2002 年到 2005 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与 97 年比,差距太大了,现在为止累计基础是 10%多一点点,并没有到位,如果说我们和东南亚国家比的话,美国人找你的麻烦,他会发表言论,然后每个国家都会来跟你谈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个升值的原因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一个是汇率低估,在一个我们利差升值空间,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经济持续增长,他并不一地看你的利差,这个地方我们经济学可能注意的都不是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升值利益的问题,它会导致你国际化发展,他也需要你的汇率来支持,提高你的投资能力,收购能力兼并能力,或者说你的反收购反兼并,很多外资到来,他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金融市场。

泡沫问题怎么看,英国的金融时报讲了,我不主张泡沫,日本虽然出现了泡沫,但是金融企业整个的资产国际的兼并能力这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从汇率本身来说,今年和明年可能会到 7 块钱左右。有一点我讲人民币也存在贬值的因素。第二个劳动力的提高,资源价值的增长也是我们可以解决汇率问题的。在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力量,外界对你的影响包括波动,所以这里面两种因素都有。

次级债危机溯源

作者: Alan Greenspan (格林斯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现 Greenspan Associates LLC 总裁, 今年他曾出版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一书。)

来源: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2007 年 12 月 13 日

文中表述不代表道琼斯的观点

今年 8 月 9 日及接下来的数天时间,全世界多个金融市场仿佛突然之间失灵了。伴随风险成本出人意料地大幅窜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投资者似乎永不会满足的追逐金融风险的欲望戛然而止。有多种类别的资产——特别是银行间拆款、资产抵押型商业票据及垃圾债券——的利率水平相对于几无风险的美国国债出现大幅上升。过去 5 年来,随着全球市场实现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市场到处弥漫着乐观情绪,市场风险逐渐被人们低估。

在这种氛围之下,这场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即使不被次级债定价不当的问题引爆,也会因为其他市场领域的问题而被点燃。以前我曾在别的场合说过,风险溢价长期偏低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在我看来,眼下这场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当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阵营各国的经济废墟也暴露了出来。在这些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之后,市场资本主义悄悄但很迅速地取代了饱受诟病的所谓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曾在第三世界国家相当盛行。

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多开始仿效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尤以中国为甚。这个模式的几大要素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工资水平不高的劳动者、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在这几大要素配合作用下,这些国家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自 200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价出口产品迅速增加,特别是输往欧美的产品更是急剧增长,导致发达国家的工资增幅放缓,进而降低了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预期,包括那些以全球性长期利率为基础的通胀预期。

此外,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全球实际利率也出现显著下降,这无疑表明,全球范围的储蓄意愿超过了投资意愿。在发展中国家,消费明显跟不上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储蓄率(储蓄额占名义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24%急速攀升到了2006年的33%,远高于同期的投资率。

然而,全球总体储蓄率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太大的增长,表明发展中国家储蓄率的上行趋势对与之伴行的发达国家投资意愿的不断下降起到了很大程度的调和作用。美国的创新及生产率增速2004年开始就明显放慢了脚步。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今年3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导致全球实际长期利率下滑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全球投资的减弱。

全球长期利率下滑不可避免地导致证券溢价和房地产现值利率偏低。相应地,资产价格则大幅升高。由此,全球股价不仅从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阴影中恢复过来,还实现了进一步提升。

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市值目前已超过50万亿美元,较2002年的水平增长了一倍多。全球范围的住房价格急速上升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只有日本和德国等(因为不同原因)成为少数的例外。《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的调查揭示了过去10年间20多个国家住房价格涨幅表现出的惊人的趋同走势。美国房价涨幅最高的时候也未超过平均水平。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目睹过无数次价格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投机热把自己烧毁之前,泡沫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策手段被安全地挤掉。对人类的这种疯狂情绪世界各国央行显然也无能为力。这种癫狂在某些方面不禁让人想起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热和18世纪的“南海泡沫”。

对于为应对互联网泡沫而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尤其是2003年年中为抵消可能出现的通缩而将利率设定在1%水平的做法,我毫不怀疑它们降低了可调息按揭利率水平,而且可能对美国房价的上涨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举措对以

ARM为资金来源的房屋需求影响不大。

那段时间的需求是受价格上涨预期推动的——这种动力正是导致大多数资产价格泡沫的罪魁祸首。就算不能获得可调息贷款,大多数需求也会通过固定利率长期抵押贷款获得融资。事实上,ARM融资(按季度调节)高峰之后的两年里,房价还一直在上涨。

我和Fed的同事认为,2003年确实存在破坏性通缩的潜在威胁,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被认为发生通缩的可能性最大。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暂时的1%联邦基金利率能否抵御通缩危机(那可能是一场比这次的危机更可怕的危机)。但我那时确实担心,长时间保持低利率会造成问题。在联邦基金利率为1%的时候,无论是货币基础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幅都没有超过5%,这让我大大松了口气,我不再担心这个利率给经济埋下了通胀的导火线。

2004年中期,随着经济形势趋于稳定,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改变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之前曾期望长期利率能相应走高,这样或许能抑制当时节节攀升的美国房价。但这种局面并未出现。我们曾预计包括贷款抵押利率在内的长期利率将会上升,正如之前从1980年开始的五个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那样。但在2004年春季有所上扬之后,长期利率再度回落,而尽管Fed在2005年大力采取紧缩措施,长期利率却几乎没有变化。

回顾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实力似乎已有效控制了中长期贷款的利率水平。美国短期和长期利率的交互作用依然十分显著,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确在逐渐减弱。从更大范围来看,资产价格正与短期利率逐渐脱钩。

证券、债券和房地产以及有资产中间机构派生的金融资产等可套利资产现在正消耗着各国央行的资源。全球长期有价证券的市值接近100万亿美元。利差交易和外汇市场十分庞大。

这些市场的“深度”在2004年3月间表露无遗。当时,日本金融主管部门在之前三个月累计买入1,500亿美元后突然停止支持美元。除了刚停手后的几天有些许震荡外,似乎并无持续的重大影响。甚至日本买入的当时看来可谓天量的外汇也只是让全球可交易证券市场的价格略有波动而已。

理论上,央行可以无限扩展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而实际上,它们会受到自身政策可能引发的通胀影响的制约。可以说,各国政府及央行早就失去了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合作稳定货币的能力。总的来说,全球的经济力量加之较低的国际贸易壁垒使得各国政府影响经济走向的可能性大大减弱。

虽然各国央行似乎对长期利率已失去操控能力,但在中短期资产市场上它们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央行因而得以保留调控商品和服务价格压力进而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能力。

当新建房屋库存陆续清理、房价下跌走势结束之后,目前的信贷危机也将结束。这将令现阶段还不确定的房屋净值稳定下来,它是所有房屋抵押贷款的依靠,最重要的是它是住房抵押担保证券的质押品。毫无疑问,信贷危机将导致大规模冲销。但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调整之后,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重新回到正轨。



**Guide:**

- ❖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征文通告
- ❖ Motivation and Strategies to Learn English: The Case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将于 2008 年 10 月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 现向全体会员和学界同仁征求论文。烟台会议以来, 国内发生了一些大事, 如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推出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翻译本科专业与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 以及对中译

外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世界翻译大会即将首次在中国召开等等, 这些都与学会的工作和研究宗旨密切相关。因此本次大会的主题定为“新形势, 新对策”, 并提出以下议题供撰文参考, 但不必受其局限。我们特别欢迎围绕会议主题撰写的别出心裁且有独到见解的论文。

- ✚ 英汉对比与语言哲学方向: 1. 语言哲学跟语言研究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关系; 2. 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英汉语对比研究; 3. 语言类型学与英汉语对比研究; 4. 英汉对比研究与英汉语本体研究; 5. 英汉语语法化与词汇化对比研究; 6.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原创性实证对比研究。
- ✚ 英汉翻译与语篇对比方向: 1.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动向; 2. 中国翻译学发展 20 年的回顾; 3. 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 (包括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等); 4. 语篇对比与翻译研究; 5. 英汉信息结构比较研究; 6. 中译英与英译中的不同性质与对策; 7. 译学词典的建设与研究。
- ✚ 中西文化对比与典籍翻译方向: 1. 多元文化中的英汉语比较研究; 2. 全球化背景下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研究; 3. 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研究; 4. 典籍翻译名家名译研究; 5. 典籍翻译的译本\译作比较研究; 6. 典籍翻译理论研究和队伍建设。

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均可, 请将全文 (A4 纸, 汉字 5 号字, 行距 1.5) 一式 3 份于 2008 年 4 月 10 日前寄至:

江西省南昌市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司显柱教授 收 (邮编 330013)

电话: 0791—3843868 手机: 13755679560 电子邮件: sixianzhu@yahoo.com.cn

或曾剑平教授 (0791—3843198, 电子邮件 zengjp115@163.com)。

请附上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称职务、通讯地址、手机号码及电子邮件地址。

论文经评审后将于 2008 年 5 月发出正式通知。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讨论会



Motivation and Strategies to Learn English:



The Case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Dr. Ruth Ming Har Wo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a study of motivation and strategies toward learning English used by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The aims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are un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if they are not going to use English substantially in the future and to examine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participants adopt during English lessons. Gardner's (1985) Attitude/Motivation Test Battery was modified and administered to elicit pre-servic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to learn English, their preferences and needs to learn English, as well as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in learning English.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pos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o current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and may help educators to identify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by non-English major teachers.

Key words: motivation, learning strategies,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Introduction

In Hong Kong,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language for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easons (Johnson, 1998; Pennycook, 1995), and it has been a compulsory subject in schools since the British colonial years. However, people in Hong Kong have been more eager to learn Putonghau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years (Shanghai Daily, 2007) as predicted by Lord (1987), Kwo (1994) and Pierson (1994) long before the handover of sovereignt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language education, 90%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were to implement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using Cantonese to teach all subjects except language-based subjects) and Putonghau to teach Chinese as a sign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decolonialization.

Thus whether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are still eager to learn English or if a desire to learn Putonghua has replaced the necessity of English pose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research.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otivation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 post-colonially. These **pre-service**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take an English foundation course, which aims to develop learner autonomy,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and presentations skill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training.

Literature Review

The literature is useful in identifying two areas for investigating





pre-servic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They include Chinese learners'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and teacher motivation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However, the literature only provides a general direction for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for several reasons:

1) motivational patterns described in the literature were of a general group of Chinese learners or a group of teachers who were already bilingual and may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han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2) Pre-service Chinese teacher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hasn't been explored in the literature previously.

3) All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1970's-1990's, signifying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revisit this issue.

One useful aspect of the literature investigates Chinese learners' motivation from a macro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Gardner and Lambert (1972),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concerns how the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utilized as a useful instrument towards furthering other aims and goals, such as further study or improving job prospects, while "integrative motivation" refers to a desire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group and gain closer contact with them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ulture. Richards (1993) and Lin and Detaramani (1998) believed Hong Kong students are instrumentally motivated. That is, learners are eager to obtain something practical or concrete from the study of a second language (Hudson, 2000). Lin and Detaramani (1998) explained that Hong Kong students

learn English because it is required for entering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parents als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examinations. Fu (1974) conducted a survey investigating 561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found clear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s. In the post-1997 years, after Hong Kong join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i (1999) reexamined Hong Kong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and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Fu (1987) and Walters and Balla (1992), there is a paradox: Hong Kong students seem very instrumentally motivated, but students are reluctant to engage in independ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It wa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reluctance stemmed from cultural constraints or as Walters and Balla (1992) suggested, a lack of integrative motivation.

Meanwhile, Biggs (1995) believed Chinese learners see learning in a practical way. He stated, "Westerners have seen integrative motivation as the only way of defining what is meaningful and worthwhile...the Chinese learner may see things more pragmatically...the deep strategy may be activated by a head of mixed motivational steam: personal ambition, family face, peer support, material reward...and interest."

Even more basic were those very Confucian internal dispositions that created a sense of diligence and receptiveness." Biggs (1995) believed achievement enhances Westerners' egos, but what constitutes success in a Chinese context may be determined by other factors: e.g. family, group, or the society as a whole. Further, the pressure on Hong Kong students to



study hard is notorious regardless of family. Chinese learners are likely to ascribe their performance to be due to controllable factors such as effort and study methods. Ability itself is perceived by Chinese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as an attribute that can be modified through effort.

Different motives also influenced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language use patterns of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in Hong Kong (Richards, 1993). Findings suggested motiv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cause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to a number of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learning process: e.g., attitudes, attributions, view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choice, and language use patterns. Students who were motivated mainly by a strong intrinsic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to be able to use it a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had a greater preference for communication-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used English more frequently and in a greater variety of contex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motivated mainly by a desire to pass exams or enhance their career prospects.

The above studies only examined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Hong Kong students in general but not pre-service Chinese teachers, whom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Besides, all the abov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and not much has been done in the past decade. Therefore, it will be meaningful to revisit this issue

Another useful aspect of the literature is teacher motivation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looking into this area but they tend to focus on cognitive elements like efficacy (Ashton, Webb & Doda, 1983; Ashton, 1984, and Gorrell & Capron, 1991) and causation (deCharms, 1968, and Johnson, Baldwin & Wiley, 1969). The results of several studies looking into bilingual teacher motivation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reveal two extremes (Laughlin, 1996 and Valerio, 1997). Studies found teacher motivation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is largely for the benefits of their students (Laughlin, 1996),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 motivation for acquisition of Spanish in the US is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remedy oppressive conditions for Spanish-speaking students. Valerio (1997) revealed that for bilingual teachers, the decision to become teachers was influenced by positive role models they had as teachers. Findings suggested motiv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econd language had as students.

A study conducted by Thicksten (1996), however, found that only one out of five teachers welcomed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panish and teach in a bilingual classroom.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sparities among the above studies are possibly because Laughlin (1996) and Valerio's (1997) studies were conducted with a group of teachers who were already bilingual and therefore had a positive image of bilingualism in general. However, Thicksten's work studied teachers who were monolingual. The results hence indicated they were less favorable toward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bove studies were all conducted in the US and may not apply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ll this gap and draw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education.

Purpose of the Study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Research question 1:

Are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instrumentally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as repeatedly suggested by previous studies?

Research question 2:

How does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affect their strategies when learning Englis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s?

Methodology

Participants

70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from Hong Kong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aged 19-20 and were required to enroll in a one-year English foundation course by a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 in Hong Kong. They all had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more than 15 years and passed a public examination for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econdary school.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 all received a grade D or E, an average grade, in “Use of English” in their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of which 60 percent of all candidates received Grade D or E while 20 percents received Grade A, B and C, and 20 received a failing grade. According to their grade on the examination, this group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language only possessed an average level of English competency.

Instru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respondents were given a questionnair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learning English, and some participants were later interviewed by the researcher.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based on Gardner’s (1985) Attitude/Motivation Test Battery. To conduct the survey, the researcher explained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to the participants before completing the questionnaire. Respondents were given the questionnaire during the lecture time for a module titled “Foundations in English.” The questionnaire was worded in simple English to ensure respondents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it. Respondents were reminded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was completely voluntary. Informed consent forms were distributed. Respondents were reminded that data collected would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Respondents were given 15 minut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earcher also stayed in the classroom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there were 36 questions in total, divided into seven sections. The questionnaire employed a six-point scale for participants to indicate their answers (6 strongly agree, 5 agree, 4 tend to agree, 3 tend to disagree, 2 disagree, and 1 strongly disagree). The complete questionnaire is included in Appendix 1.



Interviews

Face-to-fac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fter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ere areas in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which required explanation, so the interviews filled this gap by providing further explanation and triangulation.

Ten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randomly interview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a counselling room, in which a private environment could help respondents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bout English learning. The researcher first thanked them for participating and explained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view and how it would be conducted. Respondents were reminded the interview would be recorded, and their responses would remain confidential. The language of the interview was Cantonese, the language respondents felt most comfortable with.

Data analysis

Descriptive analyses were used to project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English learning.

Statistical results

Table 1 summarizes the descriptive data. Variables include pre-service teacher preference, pre-service teacher needs, integrative motivation orientation, interest in English,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orientation, English class anxiety,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 reliability test on the 36-item questionnaire was run to test for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all the items. 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Cronbach alphas) was high, which mean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36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was high (see Table 1).

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and Reliability Estimation for the Questionnaire (N=70)

Variables	Subjects	Items	Mean	Std. Deviation	Cronbach Alpha (reliability)
V1: Pre-service teacher preference	70	4	5.11	0.822	0.788
V2: Pre-service teacher needs	70	3	4.33	0.924	0.826
V3: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speaking people/Integrative motivation orientation	70	2	5.05	0.856	0.768
V4: Interest in English	70	2	5.52	0.838	0.788
V5: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orientation	70	2	5.09	0.972	0.812
V6:					
English class anxiety	70	3	3.83	1.212	0.844
V7: Learning strategies					
Eager and active	70	8	3.89	0.786	0.747
Passive	70	12	3.39	0.868	0.792

Among the motivation variables analyzed (V1-V6), Chinese pre-service teacher interes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regarding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M=5.52$), and they also believe learning English is useful (V1 and V5) ($M=5.11$ and $M=5.09$). They have an integrative motivation orientation towards English ($V4= 5.52$). However, they do not see the need to use English as imminent (V2) ($M=4.33$). Results also show pre-service teachers are anxious when learning English in class (V6) ($M=3.83$).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y employ are generally positive (V7).

Discussion

Preference and needs

Based on the means of the two categories “pre-service teacher preference” and “pre-service teacher needs,” one can see both categories exhibited high means (pre-service teacher preference $M=5.09$, pre-service teacher needs $M=4.33$). Pre-service teacher preference refers to the learning approach or style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tend to adopt whe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dicate pre-service teachers hold strong preferenc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lthough they are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they do not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English and see it as important. One pre-service teacher indica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hich all teachers of all languages should learn so as to broaden their world knowledge with respect to exchanging ideas on teaching and contributing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rticipants were also aware of the need to learn English even though they may not use English as much as Chinese in their careers. Learning needs refers to what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would like to learn. They know English is important to their teacher development. These results are similar to Richards (1993), Fu (1987), and Walter and Balla (1992), who also found Chinese learners in Hong Kong are instrumentally motivated. One participant confirmed this in an interview by saying, “I expect myself to have job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maybe become a school principal or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English is definitely a must to help my career advancement. If I want to speak on behalf of my school, English is a definite asset.”

Also, participants see English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arning because they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learn English from a very young age. Additionally,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learning is heavily stressed in Hong Kong, and English seems to be an inevitable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One



respondent in an interview said he “feel(s) strange to stop learning English.” Biggs (1995)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learners may be activated by a combination of motivating factors: personal ambition, family face, peer support, and interest.

Motivation orientation

The means of “integrative motivation orientation,” “interest in English,” and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are high. Conclusions suggested from the results indicate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are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because of interest in English and its importance for their futures. One respondent in an interview replied, “I can’t say for sure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 maybe I will become a Chinese teacher, maybe I won’t. Who knows? I am sure improving English won’t do me any harm. Plus being proficien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can be very impressive, too.” This revealed that this teacher trainee considered being bilingual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 advantage. Another respondent discussed his integrative motivation orientation to learn English in an interview, “Although I will be a Chinese teacher in the future, I like the way English words sound. It is melodic, unlike Cantonese.” Another participant also stated why he liked English in an interview: “I like friends and talk to ‘Net’ friends from talking to local ‘Net’ friends in ICQ English is the only means to know people across cultures.”



Based on the first two motivation variables’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the interview results, new light has been shed on previous research (Fu 1987; Walters & Balla 1992; Biggs 1995; Lin & Detaramani, 1998), which indicates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have strong intrinsic motivation.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after participants passed the public examination and English was no longer a worry, they were freed from examination pressure yet continued to study English. They could start to appreciate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its own merits,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was enhanced.

Learn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participants employed different strateg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Learning strategies refer to the techniques pre-service teachers employ when learning English. The following sections explain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ies employed by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s.

➤ Inside the classroom

One of the statistical findings regarding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ies is that class anxiety is a factor affecting pre-servic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motivation toward learning English in class, with a mean of 3.73. The mean of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y would be embarrassed to volunteer answering a teacher question was 3.96. Whe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whether they felt nervous and confused when they were speaking in English, the mean was 3.89.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were rather neutral. A respondent commented in an interview, “All our other lectures are conducted in Chinese, and we always communicate with our friends in Cantonese. How possibly could we not feel embarrassed to volunteer answering questions in English? Answering questions in Chinese is fine, we all feel comfortable with it...but not English.” “Face” is also a hurdle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This is echoed in the response to another question, of which the mean was 4.06: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will only answer when my teacher asks me a question.” Participants only answering questions when teachers asked is embedded in the learning culture in China. Giving answers without first raising your hand is considered to be impolite. Therefore, most participants were used to a learning culture where they only answer questions when asked.

When asking about participation in English classe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no clear answer because the means of being passive and only answering easy questions were 3.65 and 3.20 respectively. Though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were not particularly clear, one respondent revealed his opinion in an interview, “Answering easy questions in class does not show how clever you are. It might project an impression to your classmates that you are flattering your teacher...only answering difficult questions impresses our friends. How can one say we don’t contribute in class? We

are only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and the right question to answer only.”



➤ Outside the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participants care about their studi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Items like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always review my mistakes and correct them as far as I can” had a high mean of 4.37; “When I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immediately ask the teacher for help” had a mean of 4.00, and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work very carefully, making sure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had a mean of 4.20. These results indicate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spend time outside the classroom reviewing lessons.

However, pre-service teachers’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assignments and problems from school work were complicated, and no conclusion could be reached because the means were neutral. The means for participants seeking help just before the assignment due date was 3.51, while for the items “just forget about it when they come across any problems”; “just skim over their homework,” and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put some effort into it, but not as much as I could” received means of 3.48, 3.37 and 3.44.

One item in the questionnaire asked participants whether they believed in luck and intelligence could bring them good results, and participants again gave a neutral response with a mean of 3.62. Therefore,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Chinese learners considered effort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ir academic success. This echoes the results from previous studies (Salili and Hau, 1994; Lin and Detaramani, 1998).

However, it was interesting that participants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ything unrelated to academic English wasn't a common strategy for English learning. Whe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whether they tried learning English by watching TV, listening to pop songs, or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without reading Chinese subtitles, participants responded differently. They prefer casually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ovies and TV but not songs or in a conscious way, like listening to the dialogues without reading the Chinese subtitles. The results signify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English teaching by using language arts and a task-based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articipants see English learning as important because it has been stressed extensively by the government, examination authority, parents, and teachers.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resented findings concerning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trategies. It was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were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both instrumentally and integratively. They learned English because it was useful for their future and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people across cultures. However, the curr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still largely exam-oriented, which affects learner attitudes at the tertiary level. This exam-centered policy overlooks the importance of helping learners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language itself.

Results also found this group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was passive inside the classroom. They tended to pay less attention to authentic u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draws implications to material design. Therefore, ESL educators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incorporating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encourage learners to use language authenticall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By doing so, learners will be able to view authentic language use more positively. Classrooms are inherently an acquisition-poor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materials should be as authentic as possible.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language learners, it is important to select authentic, suitable materials and reflect on the suitability of current classroom pedagogy.

References

- ◆ Ashton, P. (1984) Teacher efficacy: A motivational paradigm for effective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35(5), pp. 28-32.
- ◆ Ashton, P. T., Webb, R. B. & Doda, N. (1983). *A study of 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
- ◆ Final Report. (Contract No. 400-79-0075).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 Biggs, J. (1995) Motivating learning. In J. Biggs & D. Walkins, (Eds.), *Classroom lear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for the Asian teacher*.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 De Charms, R. (1968). *Personal causation*. Wiley: Academic Press.
- ◆ Dunkin, M.J. & Biddle, B.J. (1974). *The study of teach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 Fu, G. S. (1975)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 Fu, G. S. (1987). The Hong Kong bilingual. In R. Lord & H. N. L. Cheng (Eds.),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 Gardner, R. C. & Lambert, W.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 Gardner, R. C. (1985) *Social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London: Ontario: Edward Arnold.
- ◆ Gorrell, J. & Capron, E. (1990). Cognitive modeling and self-efficacy: Effects on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ing of teach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1(5), pp. 15-22.
- ◆ Hudson, G. (2000). *Essential 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 ◆ Johnson, K. (1998)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M. C. Pennington (Ed.) *Language in Hong Kong at Century's E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 Johnson, T. J., Baldwin, T. & Wiley, D. E. (1969).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and attribution of causation*. (Final Report, Project No. 5-1068) Washington, D.C. U.S. Office of Education.
- ◆ Kwo, O. W. Y. (1994) The teaching of Putonghua in Hong Kong schools: Language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 In G. A. Postiglione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 towar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p. 184-203).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 Lai, E. F. (1999).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in Hong Kong.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2 (3), pp. 280-84.
- ◆ Laughlin, M. C. (1996). *Crossing borders: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s of Euro-American bilingual teachers in a Spanish-speaking context, a participatory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 ◆ Lin, A. M. Y. & Detaramani, C. (1998). By carrot and by rod: Extrinsic motivation And English attainment of terti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 M. C. Pennington (Ed.), *Language in Hong Kong at century's end* (pp. 285-30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 Lord, R. (1987)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especially) future. In R. Lord and H. N. L. Cheng (Eds.),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p.3-26).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 Pennycook, A. (1995). English in the world / The world in English. In J. W. Tollefson (Ed.),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Language Edu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Pierson, H. (1994) Cantonese, English, or Putunghua – Unresolved communicative issue in Hong Kong future. In G. A. Postiglione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 towar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p. 168-83).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 Richards, S. (1993)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Research Report 32).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 ◆ Salili, F. & Hau, T. (1994). The effect of teachers' evaluative feedback on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ability: A cultural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Education Studies*, 20, 223-236.





- ◆ Scovel, T. (1991). The effect of affect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review of the anxiety research. In E. K. Horwitz and D. J. Young, (Eds.), *Language anxiety*, pp.101-108.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 Shanghai Daily (2007, July 3). Hong Kong eager learn Mandarin. Retrieved August 1, 2007, from http://www.shanghaidaily.com/sp/article/2007/200707/20070703/article_321893.htm
- ◆ Thicksten, M. L. (1996) *The nature of teacher acceptance of and resistance to bilingual educ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 ◆ Valerio, M. R. (1997) Examining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s' existing beliefs: Three phases of a restructured 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 *Issues in Teacher Education*, 6(2), 11-21.
- ◆ Walters, S. & Balla, J. R. (1992)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at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Research Report 17*). Hong Kong: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ppendix 1

Questionnaire for Participants

Dear Students,

Because you are pre-servic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aking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collect your views on learning English. Please use a pen / pencil to circle the number which best reflect your opinion o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your time. Thank you.

		Strongly agree	agree	Tend to agree	Tend to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Students' preference							
1	I want to take English course to improve my English proficiency.	6	5	4	3	2	1
2	Even if I were not required to take an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I would still want to take one.	6	5	4	3	2	1
3	If I had a choice to take language course, I would still want to take an English course.	6	5	4	3	2	1
4	I think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still take an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6	5	4	3	2	1
Students' needs							
5	I can see the need of using English to give a presentation.	6	5	4	3	2	1
6	Whenever I write diary, I will try to write in English.	6	5	4	3	2	1
7	I can see the need to use English to write academic paper.	6	5	4	3	2	1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 Integrative orientation							
8	I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6	5	4	3	2	1





9	The more I get to know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the more I want to be	6	5	4	3	2	1
Interest in English							
10	If I were visiting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6	5	4	3	2	1
11	I often wish I could read and listen to English fluently.	6	5	4	3	2	1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12	Studying English can be important for me only because I will need it for my future career.	6	5	4	3	2	1
13	Studying English can make me become a more knowledgeable person.	6	5	4	3	2	1
English class anxiety							
14	It embarrassed me to volunteer answers in our English class.	6	5	4	3	2	1
15	I get nervous and confused when I am speaking in English.	6	5	4	3	2	1
16	I am afraid the other students will laugh at me when I speak English.	6	5	4	3	2	1
Learning Strategies							
17	When I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immediately ask the teacher for help.	6	5	4	3	2	1
18	When I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only seek help just before the assignment due.	6	5	4	3	2	1
19	When I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just forget about it.	6	5	4	3	2	1
20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put some effort into it, but not as much as I could.	6	5	4	3	2	1
21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work very carefully, making sure I understand	6	5	4	3	2	1





	everything.						
22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just skim over.	6	5	4	3	2	1
23	Considering how I study English,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I do just enough work to get along.	6	5	4	3	2	1
24	Considering how I study English, I will pass on the basis of sheer luck or intelligence because I do very little work.	6	5	4	3	2	1
25	Considering how I study English, I really try to learn English.	6	5	4	3	2	1
26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always review my mistakes and correct them as far as I can.	6	5	4	3	2	1
27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don't want to look at my mistakes.	6	5	4	3	2	1
28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look over them, but I won't bother to correct them.	6	5	4	3	2	1
29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volunteer answers as much as possible.	6	5	4	3	2	1
30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answer only easy questions.	6	5	4	3	2	1
31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never say anything.	6	5	4	3	2	1
32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will only answer when my teacher asks me question.	6	5	4	3	2	1
33	I don't watch English TV.	6	5	4	3	2	1
34	I always watch English movies.	6	5	4	3	2	1
35	I learn English through pop songs.	6	5	4	3	2	1
36	I always try to listen to the English spoken by the TV/movie stars without reading the subtitles.	6	5	4	3	2	1

Thank you very much.

Appendix 2

Summary Statistics and Reliability Estimation for the Questionnaire (N=70)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Q1 I want to take an English course to improve my English proficiency.	3.00	6.00	5.31	.760





Q2 Even if I were not required to take an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I would still want to take one.	3.00	6.00	5.03	.905
Q3 If I had a choice to take a language course, I would still want to take an English course.	2.00	6.00	4.79	1.048
Q4 I think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still take an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3.00	6.00	5.31	.806
Q5 I can see the need of using English to give a presentation.	3.00	6.00	5.03	.865
Q6 Whenever I write in a diary, I will try to write in English.	1.00	5.00	3.24	1.090
Q7 I can see the need to use English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3.00	6.00	5.03	.865
Q8 I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English-speaking people	4.00	6.00	5.24	.739
Q9 The more I get to know English-speaking people, the more I want to be like them.	3.00	6.00	4.86	.915
Q10 If I were visiting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4.00	6.00	5.55	.631
Q11 I often wish I could read and listen to English fluently.	1.00	6.00	5.48	1.089
Q12 Studying English is important for me only because I will need it for my future career.	3.00	6.00	4.93	1.131
Q13 Studying English can make me become a more knowledgeable person.	3.00	6.00	5.24	.786
Q14 It embarrassed me to volunteer answers in our English class.	1.00	6.00	3.96	1.238
Q15 I get nervous and confused when I am speaking in English.	1.00	6.00	3.89	1.175
Q16 I am afraid the other students will laugh at me when I speak English.	1.00	6.00	3.65	1.395
Q17 When I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immediately ask the teacher for help.	1.00	6.00	4.00	1.000
Q18 When I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only seek help just before the assignment is due.	2.00	5.00	3.51	.737
Q19 When I have a problem	2.00	5.00	3.48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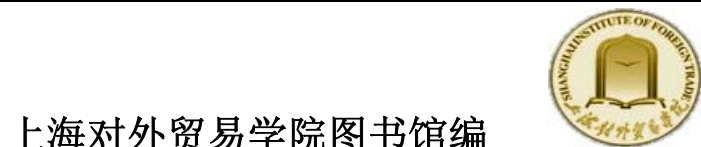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e are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I just forget about it.				
Q20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put some effort into it, but not as much as I could.	1.00	5.00	3.44	.948
Q21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work very carefully, making sure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3.00	6.00	4.20	.818
Q22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homework, I just skim over it.	2.00	5.00	3.37	.820
Q23 Considering how I study English,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I do just enough work to get along.	3.00	6.00	4.10	.772
Q24 Considering how I study English, I will pass on the basis of sheer luck or intelligence because I do very little work.	2.00	5.00	3.62	1.014
Q25 Considering how I study English, I really try to learn English.	2.00	4.00	3.48	.633
Q26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always review my mistakes and correct them as far as I can.	3.00	6.00	4.37	.902
Q27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don't want to look at my mistakes.	1.00	4.00	2.58	.866
Q28 After I get my English assignment back, I look over them, but I won't bother to correct them.	1.00	6.00	3.13	.953
Q29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volunteer answers as much as possible.	1.00	6.00	3.34	1.044
Q30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answer only easy questions.	2.00	5.00	3.65	.856
Q31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never say anything.	1.00	5.00	3.20	1.013
Q32 When I am in English class, I will only answer when my teacher asks me a question.	2.00	5.00	4.06	.703
Q33 I don't watch English TV.	1.00	4.00	2.44	1.055
Q34 I always watch English movies.	3.00	6.00	4.48	1.213
Q35 I learn English through pop songs.	2.00	5.00	3.72	1.098
Q36 I always try to listen to the English spoken by the TV/movie stars without reading the subtitles.	1.00	6.00	3.55	.985
Valid N (listwise)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法 学 动 态	➤ 新法解读 ◇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 新外商投资目录开放领域扩大
	➤ 法治论坛 ◇ 经济法—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法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修改的有关法律问题
2007 年 12 月	➤ 法学教育 ◇ 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第 8 期 [总第十七期]

新法解读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日前，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实施条例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为便于大家理解实施条例有关内容，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的背景是什么？

答：2007 年 3 月 16 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并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企业所得税法的顺利施行，有必要制定实施条例，对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进一步细化，并与企业所得税法同步施行。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国务院法制办就送审稿征求了全国人大相关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召开座谈会听取了部分内、外资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草案）》，报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国务院令形式公布施行。

问：实施条例对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纳税人作了哪些细化规定？

答：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所得税法的可操作性，明确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范围，实施条例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企业所得税法将纳税人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并分别规定其纳税义务，即居民企业就其境内外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部分纳税。同时，为了防范企业避税，对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也认定为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还应当就其取得的与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境外所得纳税。为此，实施条例对“实际管理机构”的政策含义做了明确，即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





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对非居民企业所设立的“机构、场所”的政策含义也做了明确，即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包括管理机构、营业机构、办事机构、工厂、农场、提供劳务的场所、从事工程作业的场所等，并明确非居民企业委托营业代理人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包括委托单位和个人经常代其签订合同，或者储存、交付货物等，视为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问：实施条例对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收入作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同时，实施条例明确了企业取得的各种形式收入的概念，以及收入实现的确认方法。

问：实施条例对企业支出扣除的原则、范围和标准作了哪些规定？

答：企业所发生的支出，是否准予在税前扣除，以及扣除范围和标准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进而影响到企业应纳税额的大小。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为进一步明确企业支出准予税前扣除的基本原则，实施条例规定，准予企业税前扣除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在此基础上，实施条例对企业支出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主要作了以下具体规定：

（一）明确了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

老税法对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扣除实行计税工资制度，对外资企业实行据实扣除制度，这是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实施条例统一了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对合理的判断，主要从雇员实际提供的服务与报酬总额在数量上是否配比合理进行，凡是符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常规而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都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

（二）具体规定了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

老税法规定，对企业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14%、2%、1.5%计算扣除。实施条例继续维持了职工福利费和工会经费的扣除标准，但由于计税工资已经放开，实施条例将“计税工资总额”调整为“工资薪金总额”，扣除额也就相应提高。为鼓励企业加强职工教育投入，实施条例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三）调整了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

老税法对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支出实行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限额扣除。考虑到商业招待和个人消费之间难以区分，为加强管理，同时借鉴国际经验，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四）统一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

关于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税前扣除，老税法对内资企业实行的是根据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比例限制扣除的政策，对外资企业则没有限制。实施条例统一了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同时，考虑到部分行业和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发生情况较为特殊，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实施条例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五）明确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范围和条件。

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老税法对内资企业采取在比例内扣除的办法（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对外资企业没有比例限制。为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负，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为增强企业所得税法的可操作





性,实施条例对公益性捐赠作了界定: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同时明确规定了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范围和条件。

问:实施条例对税收优惠作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实施条例对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的范围和办法作了进一步明确,主要包括:

(一)关于扶持农、林、牧、渔业发展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一)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5.牲畜、家禽的饲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8.远洋捕捞。(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二)关于鼓励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三)关于支持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从事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免三减半”的优惠,具体条件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并符合规定比例,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四)关于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

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四个方面的税收优惠,实施条例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的上述研究开发费用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加计扣除50%。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实施条例据此明确,这一优惠是指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实施条例据此明确,可以享受这一优惠的固定资产包括:(一)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五)关于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为免税收入。实施条例据此从登记程序、活动范围、财产的用途与分配等方面,界定了享受税收优惠的“非营利组织”的条件。同时,考虑到目前按相关管理规定,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为规范此类组织的活动,防止从事营利性活动可能带来的税收漏洞,实施条例规定,对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不予免税。

(六)关于非居民企业的预提税所得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但与其在中国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所得,适用税率为20%。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上述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对上述所得,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 and 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问:实施条例是如何界定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按照便于征管的原则,实施条例规定了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与现行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减按18%的税率征税,3万元至10万元的减按27%的税率征税)相比,优惠范围扩大,优惠力度有较大幅度提高。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将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范围,由现行按高新技术产品划分改为按高新技术领域划分,规定产品(服务)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范围,以解决现行政策执行中产品列举不全、覆盖面偏窄、前瞻性欠缺等问题。具体领域范围和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同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指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均不低于规定标准。这样规定,强化以研发比例为核心,税收优惠重点向自主创新型企业倾斜。

问:实施条例在特别纳税调整方面作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借鉴国际反避税经验,实施条例对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关联业务的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提供资料义务、核定征收、防范受控外国企业避税、防范资本弱化、一般反避税条款,以及对补征税款加收利息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对进行特别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规定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加收利息;对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提供有关资料的,可以只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加收利息。

问:为什么实施条例没有对汇总纳税和合并纳税的具体办法作出规定?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分别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应当汇总纳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选择由其主机构、场所汇总纳税。由此,可能出现地区间税源转移问题,各界都非常关注。由于税源转移处理属于地方财政分配问题,实施条例不宜规定得过细,授权汇总纳税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实施条例施行后,将根据“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分配”的原则,合理确定总分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分享比例和办法,妥善解决实行企业所得税法后引起的税源转移问题,处理好地区间利益关系。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二条规定,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企业之间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考虑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了法人税制,企业集团内部的母子公司原则上应独立纳税,合并纳税应从严掌握,这样也有利于减缓地区间税源转移问题。因此,没有在实施条例中规定合并纳税的范围和条件,对个别确需合并纳税的,由国务院今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具体规定。

问:为什么实施条例没有对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作出规定?

答:为了保持税收优惠政策的连续性,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对原依法享受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法律设置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特定地区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区特殊政策的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已确定的其他鼓励类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考虑到这些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内容较多,而且属于过渡性措施,为保证实施条例的稳定性,由国务院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另行规定比较妥当,因此实施条例没有对此作具体规定。

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1日

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答记者问

新外商投资目录开放领域扩大

准入政策规范透明易于执行 重点鼓励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等

从12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同时废止。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就此次《目录》修订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调整完善外资产业政策

问: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年版)进行修订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马秀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逐步结束,中国对70多个服务部门的扩大开放承诺即将全部履行到位,对外资开放的领域更为广阔。为适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适应中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有必要及时调整和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为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2004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问: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哪些突出特点?

马秀红: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以下六个特点:

第一,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修订后的《目录》共列入鼓励、限制和禁止类条目478条,其中鼓励类351条,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限制类87条,占目录比重由原来的21%减少到18%;禁止类40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9%减少到8%。

第二,进一步提高了外资政策的透明度。将中国政府加入世贸所承诺开放的领域和股比等内容均列入《目录》中,使各项法律、法规和专项政策的外资准入要求对外保持一致,形成规范、透明、易于执行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外商投资的便利程度。





第三,促进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积极推动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将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列入了鼓励类,并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发布的《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中大部分产品整理调整后列入《目录》鼓励类。

第四,鼓励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为加强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录》将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列入了鼓励类。

第五,促进平衡发展的贸易政策。取消了原目录鼓励类中“产品全部直接出口的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条目。

第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结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不再列入仅“限于中西部地区”的条目。对属于需鼓励外商投资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今后将在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指导目录》时统筹考虑列入。

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

问:新修订的《目录》对引导外资会起到哪些作用?

马秀红:新修订的《目录》坚持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重点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现代农业和基础设施,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结构得到优化,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

修订过程中,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广泛征求了政府主要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内外资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加以认真研究,努力促使外商投资准入政策更加规范、透明、易于执行,进一步便利外商投资。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吸收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收外资的方针,保持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2月12日 第05版) 记者:张意轩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

法治论坛

经济法——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法

漆多俊 中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利益资源分配关系。利益分配不公平,和谐无从谈起

——目前我国许多人对于经济法究竟为何物,它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缺乏认识,存在各种模糊观念。经济法则调整国家调节所作的再分配关系,它是经济领域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法

——如何恰当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处理好个体的经济权利同社会公众、公共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界和法律界面临的一个中心课题





经济法是伴随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国家经济职能出现而产生的,它是规范国家经济调节的法律。国家调节应当是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的一种调节机制,是对市场调节的一种再调节。

经济调节机制(包括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经济结构和运行所反映的是社会各种经济资源的占有、使用关系,说到底是有关系人们的利益关系。各种调节机制实际上是在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调节、调整,或者说是一种分配。

市场调节是基于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进行的利益分配,其价值取向是各具体生产过程中各个体间的效率和公平。国家调节是运用“国家之手”进行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其价值取向偏重于社会总体性效率和社会公平。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是以个体效率和公平为基础的;但两者也会有矛盾和冲突。国家调节所作的分配乃是在市场调节所作的分配基础上,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即社会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而进行的分配。

如果把市场调节的分配称为初次分配,那么国家调节便是一种再分配。市场调节的分配和国家调节的再分配都需要法律加以规范。规范市场调节分配的法律主要是民商法;规范国家调节再分配的法律主要是经济法。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各自领域的特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们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资源分配书。宪法是一个国家所有各种利益资源的总分配书,总合同,各个部门法律是各特定领域内的利益资源分配书,分合同。其中经济领域的利益资源分配关系,主要由民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调整。民商法适应着市场调节的要求,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它调整社会利益资源的初次分配关系;经济法则调整国家调节所作的再分配关系,它是经济领域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法。

有了民商法和市场调节的初次分配,为什么还需要经济法和国家调节的再分配呢?

所谓初次分配,乃属于经济领域内的分配,是指各具体生产过程各生产力要素和产品的占有、使用关系。在无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支配,即受市场调节。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要求,各种生产力要素和产品在各个体(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分配,体现着效率和公平等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上能够让初次分配实现效率和公平。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也存在自身固有缺陷,在生产社会化时代,它往往不能保障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形式公平口号下往往掩盖实质不公平。例如,少数垄断集团对于市场和价格的操纵及其超额垄断利润的获取,对于广大中小经营者和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率和不公平的。而民商法关于个体权利本位的立法价值取向及其自由、平等的原则无法规制垄断。一些垄断同盟(如企业合并、价格托拉斯、瓜分市场协议等)正是利用了民法的契约自由等原则实施的。

这些情况表明,在生产社会化以后,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民商法的局限性逐步显露,它们的调节和调整即它们所进行的利益资源分配,已经解决不了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它们所崇尚的个体效率和公平往往损害社会利益,它们注重的形式公平常常导致实质不公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调节和经济法的出现以及它们进行再分配,才成为历史的必然。

国家调节和经济法所进行的调节和调整,即它们对利益资源所作的再分配,是在市场调节和民商法所作的初次分配基础上,为了克服后者的局限性,协调个体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本着社会本位精神所进行的一种分配。其价值取向在于:既承认和充分维护个体正当效率和公平,又不至于因个体损害社会公众、





公共和总体效率和公平,实现真正的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正义。前面论及的国家调节三方式和经济法体系三构成,都是为此目标所作出的调节、调整 and 利益再分配。

国家调节和经济法的作用虽然十分重要,但它们应当正确恰当实行,否则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还可能把事情办坏。它们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第一,应当充分尊重和维护各个体(企业、个人)的经济权利和自由,维护各个体的经济效率和公平;国家调节和经济法不得随意侵害各个体正当的经济效率和他们间的公平。

第二,经济法所规范的国家调节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也应当对有关个体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必要调整和再分配:某些个体经济效率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公众、公共和社会总体经济效率,个体间公平(形式公平)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公平和实质公平;并且,上述该种妨害和冲突单靠市场调节和民商法无法排除和解决,必须由国家调节和经济法作出再分配。

例如,在我国近些年人们普遍关心的国家征地拆迁中,如果切实贯彻上述原则,那么就要充分尊重民间土地和房屋的原所有权,不能随意要求改变其所有权;同时,只有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真实需要,而别无其他途径解决时,才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改变该原来所有权,由国家征地拆迁,并给予合理补偿。改变原来所有权关系必须理由正当,不能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外的其他目的(如单纯商业目的);不能打着“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幌子;既然是所有权的改变(这是对原来法律关系即民法上的权利安排的一种调整,亦即“权利再分配”),就必须履行法定程序,并给予合理补偿,而不能简单粗暴行事。如果认真贯彻上述原则要求,实践中就可以避免滥征土地,避免和减少纠纷,使征地拆迁符合正义和法治要求。

国家调节职能和经济法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如果说,经济学界在整个20世纪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纳为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与市场这两者作用的关系(亦即国家调节同市场调节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于经济领域的法律而言,如何恰当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处理好经济法同民商法的关系,处理好民商法上各个体的经济权利同经济法所着重保护的社会公众、公共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便是整个20世纪和至今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一个中心课题。

我国正在进行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变革,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经济法正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它可以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尚存在许多严重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在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同职工工资及其他民众收入与福利的增长在国家GDP增长中所占的比例问题;在国家财政经费支出安排上,用于日常行政经费开支同经济建设投资、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问题;各经济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许多垄断行业,如石油、煤炭、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垄断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问题;普通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过于悬殊问题;城乡、工农差别问题;低收入家庭看病难、子女读书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目前虽然已经引起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有些改革可以说还尚未“破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努力,但从法律角度说,离不开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当然,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法律也不只是经济法一个部门法。虽然它是其中最为重要和主导性的法律,但也还需要其他有关法律部门配合。我们说经济法是一种再分配法;但我们并未将该判断句颠倒过来,说再分配法就只是经济法。因为在法的体系中还有其他法律也担负一定的再分配功能。例如,劳动法对于劳动者所提供的如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特别保护,社会保障法对于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所提





供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等，都在发挥再分配功能。不过，后面这些法律的再分配功能同经济法是密切联系的，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同经济法的再分配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经济法功能的充分和有效发挥，有待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自觉应用。目前我国许多人对于经济法究竟为何物，它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缺乏认识，存在各种模糊观念。上世纪 80 年代有人说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显然不合理；可是对于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些正确的东西人们又缺乏了解（或许没有时间和机会了解）。不了解、不认识，就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加以应用。

当前，我国经济法学界面临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继续深入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经济法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要向社会广泛宣传正确的理论，努力澄清社会上存在的对于经济法的各种模糊观念；尤其要让经济法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我国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实际，使经济法在其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法制网 <http://www.legaldaily.com.cn/> 发布时间：2007 年 12 月 17 日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修改的有关法律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九讲

刘春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天我就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修改的有关问题，汇报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作简要的介绍；二是《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的有关情况；三是《议定书》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简要介绍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TRIPS Agreement）（简称《知识产权协定》）是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最后文件之一。《知识产权协定》于 1994 年 4 月 15 日签署，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它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广泛、保护最充分的知识产权多边协定，也是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影响最大的全球性多边条约，与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共同构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

知识产权问题被纳入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并最终缔结知识产权协定，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是经济、技术全球化趋向的要求，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妥协的结果。一方面，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识产权的转让与许可使用本身就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国际货物贸易的正常发展也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此之前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没有制定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而且它们大多是专为某一类型的知识产权而制定的，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全面、综合的规定。此外，对于侵权行为的救济以及解决各国之间关于知识产权争端的机制方面的规定也是空白。在《知识产权协定》之前，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往往规定，成员国如果发生知识产权争端，可以诉诸国际法院（ICJ），但事实上，由于国际法院受理的多属政治争端，而且各国国内立法普遍不接受这种处理纠纷的方式，因此，多年来从无一起争端递交给国际法院解决。这就导致有些国家采用其他手段来解决知识





产权争端,典型如美国的特别 301 条款,单方使用贸易制裁与威胁的方法,迫使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改变相关立法或做法。在此背景下,知识产权问题作为新的议题于 1986 年被列入新一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程,并最终与其他协定一起于 1994 年 4 月 15 日在摩洛哥签署。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组织已有 151 个成员。

(一) 《知识产权协定》的宗旨

《知识产权协定》的宗旨是促进对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范围内更充分、有效的保护,以使权利人能够从其技术发明和文学艺术创作中获益,受到激励,继续努力进行发明与创作,使公众尽可能广泛的享用技术与艺术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与阻碍,确保《知识产权协定》的实施及程序不对合法贸易构成壁垒。

(二) 《知识产权协定》的内容特征

作为一个以管理全球性贸易为主要职能的多边知识产权协定,与以往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尤其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相比,《知识产权协定》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如下三方面特征:

一是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内容均加以明确化,例如保护的对象、授予的权利、允许的例外、最低保护期限等。对此,《知识产权协定》首先要求必须遵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一些主要公约中的实质性义务,除伯尔尼公约关于著作人身权的规定外,这些公约的实质性义务也成为该协定成员所要遵守的义务。协定还增加了一些实质性义务,这是以往公约所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充分的。这些内容构成《知识产权协定》的主要部分。

二是强化了知识产权的执法。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往往将这部分内容留给各成员国在其国内法中自行规定,而《知识产权协定》则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救济及其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包括民事、行政程序与救济手段、临时措施、边境措施、刑事程序等。这方面内容在《知识产权协定》中也占有很大比重。

三是引入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的新方式。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规定有关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解决,但又允许成员国在加入时对此予以保留,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知识产权协定》则规定,知识产权争端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所确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此种争端解决机制规定有争端解决机构、程序与裁决的执行,并可为此实施交叉报复。

(三) 《知识产权协定》的保护范围

《知识产权协定》所指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著作权、邻接权(包括艺术表演者对其表演的权利、唱片制作者的权利和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知识产权协定》称之为“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志(如西湖龙井、宣威火腿、哈密瓜等)、工业品外观(如汽车、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信息(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商业秘密)。

《知识产权协定》在保护范围的规定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多边条约中完整使用“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以往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无论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还是罗马公约,都只涉及知识产权中的某种单一的权利,比如工业产权(通常是指专利权和商标权等)、著作权、邻接权等。“知识产权”的概念首次规定在国际公约中,是 1967 年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但该公约仅涉及该国际组织的成立事宜,未规定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知识产权协定》的“知识产权”比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增加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等，并删除了像“科学发现”这样的范畴。

二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公共利益的优先原则。《知识产权协定》在序言中明确提出，“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private rights)”，这在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前所未有，意义特殊。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从该序言全部内容看，并非孤立地强调知识产权为私权，而是在强调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私权的同时，也同样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原则，二者相互平衡。因此，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知识产权协定》，在《知识产权协定》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并加以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承认并保护公共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三是“知识产权”概念的外延在实践中被扩大。《知识产权协定》的“知识产权”概念并未列举全部的种类，其范围以与贸易相关者为准。但是在实践中，《知识产权协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却在不断扩大。例如，在一起WTO争端解决案件中，上诉机构“驳回专家组报告关于商号并不包括在《知识产权协定》范围内的认定，并且认为WTO成员有义务根据《知识产权协定》为商号提供保护”。

(四)《知识产权协定》的原则

《知识产权协定》进一步明确了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一是国民待遇原则。《知识产权协定》规定，各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给予其他成员的国民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这一规定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完全相同，巴黎公约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已经规定的国民待遇的例外也予以保留。

二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未被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所采用。《知识产权协定》第一次把这一项国际自由贸易中最基本的原则引入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中，从而为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之间实行非歧视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知识产权协定》也规定了不适用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三是最低保护标准原则。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一样，《知识产权协定》在实体部分也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高标准。还规定，各成员应确保本协定的效力，成员可以、但并无义务在其法律中实施比协定要求更广泛的保护，只要该保护与协定的规定不相冲突。

四是平衡保护原则。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对于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作出贡献。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应当受益，并且应当有助于提升经济和社会福利，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同时还规定，各成员可以在其国内立法中具体说明在许可证（技术转让）贸易中，哪些情况下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从而可能限制竞争。各成员可采取适当措施，制止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此外，《知识产权协定》专门指出，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原则交由各成员在其法律中自行解决。不得适用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去解决知识产权用尽的问题。所谓权利用尽原则，也称首次销售原则，是指权利人首次出售包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后，其在该产品上的知识产权权利就穷尽了，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就可自由使用或再销售该产品。

二、《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的有关情况

2005年12月6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通过了《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简称《议定书》)，并开放供各成员在2007年12月1日或部长级会议可能决定的更晚日期之前接受。《议定书》不允许提出保留，将在三分之二的成员接受后生效。到目前为止，先后已有美国、瑞士、萨尔瓦多、韩国、挪威、印度、菲律宾、以色列、日本、澳大利亚等10个成员通知WTO接受《议定书》。





（一）、《议定书》的形成背景

2001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问题,特别是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流行病对人民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据报道,2002 年世界上有 1500 万人死于传染病,数千万人感染艾滋病后濒临死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等致命性传染病正在可怕地蔓延,成为狙击当地民众健康和经济发展的灾难性杀手。造成这些地区发生公共健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当地患病的居民无法获得有效的廉价治疗药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传染病的致死率尤其高,造成这种后果的重要原因,是患病者无法逾越由于药品专利而形成的治疗药品的高价壁垒。

专利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法律制度,专利权是让发明创造者对因其成果的利用而获得正当物质回报的法律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专利权是私权,是财产权。健康权则是与人的生命权、生存权紧密联系的基本人权。专利权与健康权都是法定权利,都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但是,当二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人的生存、健康权利,应当优于财产权利,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类基本价值观。

因此,专利制度同其它民事法律制度一样,在尊重和保护私权的同时,注重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奉行反对和禁止滥用私权的原则。由于专利权更多地涉及国计民生等公共利益,因此,除了反对和禁止私权的权利滥用原则以外,在专利制度中,还专门规定有强制许可等对专利权进行限制的制度,以便在专利权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在对专利权实施充分、有效的保护的同时,为切实保障公共利益不受损害提供明确的法律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问题成为了多哈会议的议题。2001 年 11 月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围绕着专利权与公共健康问题,与会代表进行了三天的谈判,经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通过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宣言》(简称《多哈宣言》)。确认了由于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传染病而给许多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所造成的公共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在遵守《知识产权协定》义务的同时,这一协定不应该成为 WTO 成员对公共健康加以保护的障碍。其目的是要求限制权利人为富不仁、见死不救,进而防止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类惨剧。为此,《多哈宣言》强调,WTO 成员有权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协定》为此目的而规定的弹性条款。

弹性条款规定,在解读《知识产权协定》的具体条款时,应当符合该协定所表明目标与宗旨;各成员有权授予强制许可,并可以自主决定授予该种许可的理由;各成员有权决定哪些构成公共健康危机,包括与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其他传染病相关之公共健康危机等国家紧急状态或者其他非常紧急之情形;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权利利用尽之条文,其效果在于由各成员自主建立其关于权利利用尽之制度,只要其遵守协定规定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多哈宣言》规定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由于那些缺乏或者不具备药品制造能力的成员在根据《知识产权协定》而有效利用强制许可时面临困难,部长级会议责成《知识产权协定》理事会对此寻求迅速的解决方案,并于 2002 年底之前向 WTO 总理事会提出报告。二是同意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遵守《知识产权协定》关于授予药品专利方面的义务,推迟至 2016 年 1 月 1 日,部长级会议责成《知识产权协定》理事会为此采取必要行动。

《多哈宣言》是一种进步,其意义是积极的,但是《多哈宣言》并未解决知识产权协定与保护公众的公共健康之间的根本冲突问题。2003 年 8 月,WTO 总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执行多哈〈关于〈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第 6 段的决定》,规定在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 WTO 成员可以授予其国内企





业生产并出口特定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不受《知识产权协定》关于强制许可的使用应主要为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的限制。

2005年12月，WTO总理事会通过了《议定书》，将上述《多哈宣言》和决定的有关内容纳入了《知识产权协定》。

（二）、《议定书》对《知识产权协定》所作的主要修改

《议定书》对《知识产权协定》的修改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知识产权协定》允许WTO成员方政府授予实施某项专利的强制许可，但又规定这种强制许可“应当主要为了供应该许可成员的国内市场”。按照《议定书》，修改后的《知识产权协定》将规定在符合有关条件的前提下，WTO成员可以授予其国内企业生产并出口特定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不再局限于供应国内市场。

第二点，《知识产权协定》原则性规定WTO成员授予强制许可时应向权利持有人支付报酬。《议定书》进一步明确，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对同一产品授予强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许可费应由出口成员支付，进口成员无需再行支付。

为确保《知识产权协定》确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顺利实施，按照《议定书》的规定，《知识产权协定》将增加附件，对“药品”、“有资格进口的成员”和“出口成员”等进行定义，并规定适用协定所须满足的条件、实施要求和技术合作等。

总之，《议定书》允许WTO成员为了向“有资格进口的成员”出口药品的目的而授予专利强制许可，突破了《知识产权协定》关于强制许可的使用应主要为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根据《议定书》，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以在国内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国内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销售或从其他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的成员进口有关治疗上述疾病的专利药品。这不仅能大大降低相关专利药品的市场价格，而且有利于更迅速和有效地控制、缓解公共健康危机。

三、《议定书》的有关法律问题和对我国的影响

（一）《议定书》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是私权与公权的关系。《知识产权协定》在其序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这是各成员的共识之一。私权也称民事权利，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规定私权或民事权利的法律被称作“私法”或“民法”。由于知识产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因而具备了私权，也就是民事权利的最本质的特征，因此知识产权被归于私权。所谓公权力，就是公法上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政府对于个人的权力，公权力是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在法治国家，政府公权力也不是无限的，从根本上说，无论私权还是公权，均需法律授予。一方面，首先通过立法对私权加以确认。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通过立法，形成公权力。私权在实际生活中，离不开公权力的保障，尤其是知识产权，在其权利形成、确认、行使和保护中，都需要公权力的参与。

二是公共健康危机的认定。公共健康危机是指因传染病引起危及公共健康的国家紧急状态和其他极端紧急情势。所称的传染病，是指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的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传染病。传染病的出现、流行，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的，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国家紧急状态。为预防或者控制传染病的出现、流行，以及治疗传染病，是属于为公共利益目的的行为。维护公共健康既是一种普





世的价值,也是重要的人权,对公共健康的认定和处理是主权国家的权力。这也符合关于“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这一《知识产权协定》的根本宗旨。

三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是指国家专利主管机关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许可,通过行政程序而直接允许第三人实施,通常包括生产、制造专利权人取得专利权的产品或技术发明,并向其颁布实施该项专利的强制许可证的法律行为。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是专利许可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征是采用行政措施限制专利权人滥用技术独占权的措施。同时,被许可人应当向专利权人支付合理的报酬。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是法律对专利权人权利实行限制的制度,这项制度体现了协定充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对知识产权的必要限制,它体现了协定宗旨中宣示的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二)《议定书》对我国的影响

《议定书》是对《知识产权协定》有关专利限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发展中成员要求防止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障碍的愿望,是广大 WTO 发展中成员长期推动和联合斗争的重要成果,对于平衡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批准《议定书》符合我国整体利益。

首先,有利于应对突发的公共健康问题。作为发展中成员,我国自身也面临着公共健康问题,如 2003 年的“非典”和 2005 年的“禽流感”。批准《议定书》后,我国在必要的时候可授予国内企业生产特定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或在向《知识产权协定》理事会通报后成为“有资格进口的成员”之后,进口某些出口成员授予强制许可并出口的特定专利药品,这有利于保障我国在紧急情况下解决突发的公共健康问题时的药品供应,及时应对公共健康问题。

其次,有利于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国药品行业生产能力比较强,如批准《议定书》,则可利用《议定书》确立的体制,在必要时授权我国企业生产特定药品的强制许可,并向最不发达成员、不具备药品生产能力或生产能力不足的发展中成员等有资格进口的成员出口。这既可支持国内药品行业的发展,也可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树立我良好的国际形象。

第三,有利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现与《议定书》的衔接。我国《专利法》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2003 年,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办法》,对强制许可的授予程序作了详细规定。2005 年,知识产权局发布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根据 WTO 有关宣言和决议,对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强制许可作出了特别规定。目前,《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也将进一步衔接《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知识产权协定》对我国已经产生法律约束力。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中这样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 WTO 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 WTO 协定”。因此,《知识产权协定》在我国国内法中并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我国法院与执法机关也不直接适用该协定。为此,我国在 2000 年、2001 年集中修订和完善了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其中包括:先后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重新颁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制订《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相应修改和重新颁布有关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实施条例;清理与世贸组织协定不相符合的法规和规章文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2006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举措。这样,将会使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上汇报有不当之处, 恳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指正。谢谢!

来源: 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 发布日期: 2007年12月07日

法学教育

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陈彬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积极适应社会发展, 转变教育观念, 注重大学生能力培养, 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囿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法学本科教育客观存在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错位。因此, 在对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能力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完善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的培养模式, 十分必要。

法学教育具有二重性, 即传授法学理论知识和训练法律实务能力。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 需要全面考量法学教育的层次、现时社会及其未来发展对法学教育的需求、法学专业生源变化情况等诸多因素。在我国, 法学本科教育主要应当围绕法律实务工作的需要培养学生的能力, 致力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与其他层次的法学教育相比较, 法学本科教育要训练学生“由一般到个别”的个案解决能力, 指导学生以其初步形成的法治理念和掌握的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处理相关事务; 训练学生“由个别到一般”的调查分析能力, 帮助其养成注重必要性论证、可行性分析和进行多方案利弊比较的思维习惯。据此, 对学生的能力培养主要应当包括:

一是学习能力。要求法学本科学生养成终生学习的意识,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不断拓展学习领域、更新知识。学习能力是一项基础能力,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都必须通过学习而获得; 创新、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法学本科学生而言, 法律实务体验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方式。

二是创新能力。要求法学本科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注重调查研究、比较分析, 习惯于透过表象努力探究事物的法律本质, 从“个别”法律问题、司法活动中努力发现“一般”法律规则、司法经验与规律。对法学本科学生而言, 创新能力的培养应当以帮助其树立创新意识、明确创新方向为重点, 不可揠苗助长, 苛求其创新水平; 不宜直接将其导入纷繁芜杂的学术争论之中, 在尚未学会观察、比较和缺乏法律实务信息积累的情况下侈谈学术。

三是实践能力。法学本科学生的实践能力主要是指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 如整理案件事实, 运用法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 适用法律条文, 处置法律事务的能力。“动手能力”与“动口能力”是人们对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形象表述。其实, 法学本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并非职业培训者对“动手”、“动口”所理解的那么简单, 它还要求毕业生具有实践理性, 并在经过较短的过渡后, 能够运用法学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 联系实际, 注重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就具体法律问题提出利大弊小的解决方案。

四是交流能力。交流, 既是重要的学习途径, 更是法律实践的必然方式。从事法律工作的人, 必须练就与各种人沟通的能力。培养法学本科学生的交流能力, 重在帮助其正确认识自己和恰当地展示自己, 善于使用社会群体语言与社会成员沟通。

五是社会适应能力。适应社会, 是社会对学生的总体期望。虽然学生来源于社会, 在现行高考政策背景下, 生源结构基本上不以学校的意志为转移, 但学生适应社会的程度, 仍应成为判断办学效果的基本标





准。对法学本科学生而言,要在现行高中教育的基础上利用短暂的四年时间训练其适应社会的能力,除需要以培养前述四种能力为基础外,还需要帮助其树立对社会的信心,正确认识和评价社会;教育其遵守社会规则,尊重社会传统,对社会有所贡献;鼓励其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努力拓展适宜从业的领域;引导其明确适应社会的真谛是适应社会的发展规律,适应社会的动力来源于适应社会的积极态度,适应社会的效果取决于认识和利用社会条件的能力。

为了适应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培养的要求,西南政法大学积极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能力培养模式。

一是创新实务人才培养方式。经过多年积累,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建成“五大平台”支撑的多元实践教学体系。其中,“课内实践基础平台”,由案例讨论、观摩审判、模拟法庭、影视教学和实验(实训)等课堂实践教学环节构成;“课外实务强化平台”,以司法案卷资料库、实务教学视听资料库为支撑,通过课外播放视听资料、开展“法律看台”实践教学活动、举办实务教学系列讲座等方式,强化实践教学效果;“网络学习拓展平台”,利用校园网建立“法律网络实务信息中心”,链接实务部门网址,为学生获取实务信息提供便捷的渠道,在校园网设立“实务视角”讨论社区,选派教师为学生进行网上答疑;“社会实践训练平台”,以专业实习和暑期社会实践为主要形式,通过强化管理,保证时间与经费,加强校外基地建设等措施,保证了社会实践的效果;“科研水平提升平台”,以指导学生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为基本形式,促进学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通过“五大平台”,巩固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深化了学生对专业基础理论的理解,训练了学生的基本技能,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是注重培育理性思考的学风。通过打造富有特色的论坛和辩论文化,着眼于对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团体协作、知识整合等多方面的训练,推动了教学改革,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交流能力。西南政法大学论坛文化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迄今,已经形成以“金开名家讲坛”、“西南法学论坛”等知名论坛为中心,以“西政青年论坛”、“毓秀讲坛”等研究生、本科生论坛为两翼的论坛体系,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效果。近三年来,以本科生为主要对象,举办各种论坛活动692场,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西南政法大学辩论文化萌芽于建校之初。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法庭辩论训练一直是学校重要的教学环节。为了繁荣辩论文化,学校成立了大学生演讲辩论协会,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与本科教学关联性强的辩论比赛,激发了学生学习知识、关注社会的热情,培养了学生注重积累、理性思辨的习惯。近年来,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在国际、国内许多重大辩论比赛中舌战群英,取得了优异成绩。例如,1999年获“上海第八届名校邀请辩论赛”冠军,2001年获“全国商事贸易模拟仲裁辩论赛”冠军,2002年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商事贸易仲裁辩论赛”,2003年获“全国首届理律杯模拟法庭辩论赛”亚军,2005年在“模拟联合国大赛”中位居各参赛高校的榜首,大学生演讲辩论协会还于同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百优社团”的光荣称号。在辩论活动中,坚持和贯彻“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尊重科学”的学术理念,提倡“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引导学生发现、探究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问题,鼓励学生审慎思考、大胆交流,帮助学生形成不盲从、不偏激的实践理性。这种自由与创新的气氛培育出了一大批既不乏“动手”、“动口”能力又鲜有“匠气”的法学专业人才。

努力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人民满意的高水平大学,其主要着力点是培养本科学生的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完善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的培养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法学院校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来源: 光明网 <http://www.gmw.cn/> 发布时间: 2007年12月14日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7 年 12 月

第 8 期[总第十六期]

本期要目

- 教育部 人事部 劳动保障部关于 2008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 大学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关系
- 如何逐步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合力
- 美国高校德育的架构及其影响

政策法规

教育部 人事部 劳动保障部 关于积极做好 2008 年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教学〔2007〕2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事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精神，认真实施《就业促进法》，切实做好 2008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实施更加积极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2008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 559 万人，就业工作任务更为艰巨。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各地和高校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抓住《就业促进法》施行的有利时机，切实做好 2008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把高校毕

业生就业纳入就业工作总体部署，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要实施更加积极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将现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按照法律规定作相应的延续、扩展、调整和完善；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

二、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公共就业服务

按照《就业促进法》关于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的规定，教育、人事、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相关机构要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对高校毕业生免费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 and 就业推荐服务，主动开展公益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就业招聘活动。有关部门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举办招聘会，不得以任何方式向高校毕业生收取费用。要严格控制大规模招聘会，加强对招聘活动的安全保卫措施。



按照国家大学生就业供求信息发布制度和网上联合招聘制度的要求,加快完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地方和高校要积极参与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每季度网上联合招聘活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网上双选活动”等分行业、分专业的网上招聘活动。各地要努力完善网络服务平台,整合各类岗位需求信息资源,提高信息发布质量,定期开展相应的网上求职招聘活动。

三、广泛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提升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

各地教育、劳动保障部门要指导高职院校把职业资格培训作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措施,对需要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高校毕业生开展相关培训。劳动保障部门应根据高校毕业生需要,组织专场职业技能鉴定,教育部门应积极配合,努力使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相关专业 80% 以上的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各地人事、劳动保障、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协调和支持,进一步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的地域范围和数量,组织更多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参加见习;积极协调落实好见习毕业生的基本生活补助,并免费提供必要的人事、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服务;鼓励企业优先录用见习毕业生,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

高校要加强市场需求调研,改革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在各省(区、市)的部分高校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监测系统,进一步强化就业状况对教学环节的反馈和导向作用。

四、大力推进高校就业指导课程和队伍建设

高校要按照“全程化、全员化、信息化、专业化”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和服务水平。将就业指导课程切实纳入高校教学计划,鼓励和提倡所有高校从 2008 年起开设就业指导必修课或必修课,并依据各校自身具体情况制订教学计划。各地和高校要定期开展就业指导教师培训,开展高校就业指导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努力建设一支相对稳定、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就业指导工作队伍。

要适应新形势需要,以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操作性为原则,加快推进就业指导课程教材建设。

五、实施“高校毕业生创业行动”,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各地和高校要及时总结和推广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典型和经验,以多种形式开展创业教育,大力倡导创业精神,培养创业能力。劳动保障部门与高校要加强合作,将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工作纳入创业培训总体规划,开展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实训,推动高校毕业生创业基地建设。

六、推动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工作取得新进展

吸纳毕业生充分就业的广阔空间在基层。要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狠抓政策落实,努力营造“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制度化环境。要继续组织实施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国家和地方项目,及时总结经验,使现有项目可持续发展;要认真研究探索高校毕业生服务农村的新途径,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尽快启动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项目,街道、社区聘用劳动保障协理员要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城市社区建设的有机结合。要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大力扶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要持续开展主题突出、生动有效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推广“行行可建功、处处可立业、劳动最光荣”的新型就业观和成才观。

七、做好对家庭经济困难并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加强离校后的就业服务

高校要对家庭经济困难并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和重点推荐,并尽量给予适当求职经济补贴;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免收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高校要加强政策宣传,使离校时未就业的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全面了解离





校后的就业政策和求职渠道。各地人事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积极为离校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开展服务,提供人事、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就业指导、就业推荐等系列服务,优先安排困难家庭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劳动保障部门要把享受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并就业困难、确有就业需求且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的援助范围,摸清人员底数,建立专门台账,确定专人联系,推荐符合其需求的岗位,落实就业援助的相关政策;要积极组织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见习,按规定落实培训、鉴定补贴和见习基本生活补助。各地要对离校回原籍的零就业家庭未就业毕业生实施重点帮扶,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和岗位帮助。各地要

采取综合措施,力争到2008年底,使半数以上返回原籍登记失业的毕业生能够实现就业。

八、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全社会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地应根据就业新形势和就业工作任务要求,按照《就业促进法》及有关规定,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一部分用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教育部 人事部 劳动保障部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来源:国研网 发布时间:2007年11月27日

赵沁平出席首届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发展论坛并讲话

由北京邮电大学发起并承办的首届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发展论坛12月11日在京举行,教育部直属的22所具有突出办学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应邀参会。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出席并讲话。

据了解,参会学校都是原来由行业部门主管,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显著的专业特色。随着我国高教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改革,这批特色型大学如何重新定位,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和特色,如何更好地为行业服务,如何建立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等话题,成为讨论的热点。

赵沁平说,特色型大学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又快又好培养社会所需专门人才的产物,是发展行业所需共性技术的产物。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应该有行业精英人才培养理念和相应的大学文化,优势学科在国内或者国际领先,成为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基地、国家行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基地以及发展行业创新文化的中心。根据各学校历史文化积淀、行业背景的不同,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应把握自身的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能力的民族行业精英人才,大力开展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建立有效的行业产学研结合机制和广泛的行业企业合作网络,成为国家的行业发展战略智囊,把发展优势学科和优化学科布局相结合,做到立行业需求之地,顶国际领先之天。

与会代表建议,大力扶持特色型大学的发展应该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建立针对特色型大学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适合特色型大学发展的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对于坚持走特色化道路的学校给予更多的政策性支持,建设一个和谐发展、更加有效的高教框架体系,使特色型大学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唐景莉 杨晨光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2日



李卫红出席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并讲话

教育部12月10日在京召开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讲话中强调,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扎实实做好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李卫红指出,把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到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中,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对教育提出的新任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的新部署,努力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新要求。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努力创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充分挖掘和发挥校园网的文化功能,用网络技术为校园文化提供传播平台和技术支持。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把校园网建设成为立德树人的新阵地,师生精神文化活动的空间,校园文化和服务的新平台。

李卫红说,近年来,高校形成了以“红色网站”为旗帜,以校园门户网站为主体,以学术、新闻、服务类网站为补充的校园网络文化阵地的分层次格局。实践证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是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断丰富校园网络文化产品,打造具有校园特色的网络文化品牌,是繁荣发展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关键所在。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保证科学办网、依法管网,是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体作用,实现校内网络资源共建、共享、共管、共创,是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有效途径。建设一支复合型、专业化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队伍,是促进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

李卫红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要进一步明确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努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努力在校园网上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时代特征,体现高校特点,针对大学生思想实际的品位高雅的网络主流文化。

李卫红说,要进一步完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体制,建立健全领导工作体制、专业培训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丰富校园网络文化内容,贯彻“三贴近”原则,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品牌;进一步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推广建立网络道德评价体系,增强学生的网络道德意识;进一步落实校园网络管理,积极探索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管理、师生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建立统一指导、各方配合、责任明确、优势互补的网络宣传、网络舆论引导、网络监管和信息员队伍等工作队伍体系。

2007年“全国高校百佳网站”也在会上揭晓,经过学生投票初选、专家评审,北京大学红旗在线网站、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海交通大学学校主页等57所高校的95个优秀网站当选。

作者:杨晨光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1日





教育理论

大学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实施需要我们努力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创新精神。作为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知识创新的高地,大学理应是建设和谐文化和创新文化的首善之区。如何认识和谐文化和创新文化的关系,发挥和谐文化和创新文化对大学自身科学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认真面对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目标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建设的先进代表,在和谐文化的各种存在形式上更能体现和谐的特征。和谐文化是大学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大学和谐文化是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文化和谐共生的复杂体系。但大学文化的和谐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重点有大学的理念和谐、发展和谐、功能和谐等。

理念的和谐。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宗旨、本质、功能及其办学规律的一种理性思考和总的认识,其核心是回答“大学是什么”、“如何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等基本问题。如果一种办学理念既能传承大学历史又能引领现实、影响未来,那么这种理念必定是先进的、和谐的理念。中国古代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文化理念,至今历久而弥新。在大学发展史上,洪堡、纽曼、赫钦斯、弗莱克斯纳、科尔和我国的蔡元培、梅贻琦等近现代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大学校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大学校长都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在我国,蔡元培不仅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更提出了实施完全人格教育和德智体美诸育和谐的思想主张。梅贻琦提出了通才教育的办学思想,要求对学生进行自然、社会和人文三方面知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而“不贵乎专技之长”。这些闪烁历史光辉的办学理念至今仍然对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颇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大学理念是一种办学的理性认识,它一经确立就会成为一种在办学实践中浸淫在校长和学者身上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追求,它告诉人们大学是什么、应当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如果一所大学的理念为广大师生所认同接受,那么它必能成为影响师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甚至行为规范的指南,成为这所大学和谐文化最重要的象征。在“多元化巨型大学”时代,大学如何既要延续和发展它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又能适应社会变迁的时代需要,承担起大学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努力构建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教学与科研、学术与行政、共性与特性、继承与创新等诸多方面的和谐关系,是大学理念必须直面回答的现实问题,因为和谐的大学理念是一所大学和谐文化的灵魂。

发展的和谐。大学和谐文化本质上体现大学的和谐发展。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高等教育事业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还面临着许多矛盾、问题和困难,诸如一些高校规模扩张的冲动依然强烈,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资产财务风险加大,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和方法偏旧,专业结构不合理,教育教学质量亟待提高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说明大学目前的发展还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高校在追求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时忽视了科学和谐协调发展的目标。事实上,定位不够科学,特色不够鲜明,创新教育缺乏,管理改革滞后的问题在不同类型的大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提出当前高校要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切实加强管理,努力办出特色,体现了国家用科学发展观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政策用心。令人





可喜的是,许多大学正在逐步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物质基础建设和外延式发展倾向,统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逐步改变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不均衡甚至分离的状况,使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相通;在坚持大学主导文化一元共性的同时,积极探索大学文化的个性和多样化发展,推动形成“和而不同”的大学文化发展格局;坚持继承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优秀成分,积极营造大学的创新文化氛围。这些变革正是科学发展观在大学和谐文化建设上的直接体现。

功能的和谐。大学文化与大学的功能紧密相联。无论是“三功能”还是“四功能”,不同层次大学的功能总是有所侧重。研究性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综合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部委直属重点大学和地方大学,它们的功能发挥程度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各有千秋。一所大学的文化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在科学定位基础上其正向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负向功能是否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大学的育人功能缺失,创新功能不足,引领功能不明显,服务功能滞后,那么大学就不可能起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大学文化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譬如,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只有既注重现代社会制器重艺的科学教育,又重视对人的价值观、道德品质、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文教育时,才能彰显大学通识教育的和谐育人功能。同样,只有切实建立起一种保障学术自由、宽容失败的科学的评价制度,不断抵制功利意识对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侵蚀,努力营造一种崇尚科学、探求真理、潜心研究、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我们的大学才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社会。在当今改革发展的巨变时代,大学和谐文化建设迫切需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科学家,用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思维方式和创新成果去引领社会和谐文化的发展,发挥大学文化的思想引领、精神凝聚和文化辐射作用。

二、创新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本质属性

创新文化是大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以创新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是决定大学兴衰的灵魂和推动大学进步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大学的地位、特点和基本功能,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都决定了大学的创新文化比其他社会组织更独特、更凸显,更能体现大学文化的内在本质。

从大学的起源和发展看,创新文化一直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和主脉。大学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和文化中心,它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和社会精神的先驱。作为中世纪大学原型的巴黎和博洛尼亚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中心和学术中心,它们本身就是教育革新的产物。尽管中世纪后期的大学成为保守势力利用的工具,但它无疑对发展科学知识,活跃当时的思想文化,促进城市繁荣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至于大学与教堂、议会一起被称为中世纪三个最具历史价值的遗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大学的发展,为大学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维萨里这些曾在大学学习或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对近代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十九世纪初大学的改革运动催生了洪堡的教育改革思想,使大学正式确立了科学研究的职能,进入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从此大学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发展科学、创造知识的场所。洪堡的教育思想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大学教育,从而创造了近代大学的模式。大学活跃的学术吸引了大批一流的学者、科学家和理论家,使大学成为近代学术和科学创新的源泉,促进了大学文化创新特质的生成,推动了西方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更是凭借其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对社会经济的卓越贡献而不断走在创新的前沿。

从大学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看,创新文化是大学必不可少的存在条件。大学融入社会并不仅仅只是服务社会,而是既服务社会又引领社会前进。大学作为教育的最高机构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其本质就在于不断创造新知,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性精神,不断创造更优秀的文明成果,并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现实文化进行分析,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引导社会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相反,如果大学





缺乏创新文化,大学就会失去服务和引领社会进步的立身之本。作为“知识之城”和“智力之城”,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创新人才,而且已经成为新思想、新发现、新学说、新方法、新知识的主要创立者,成为社会文化创新的先行者和引领者,并以此不断巩固着大学的社会地位。

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创新文化对我国大学显得尤为紧迫和突出。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直接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事实上,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通过“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有力地推动了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增强了高校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十五”期间全国大学在国家三大科技奖励中获奖虽然已超过一半,但与国家的期望和国外著名大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许多大学的传统习惯思维和经验主义管理方式依然严重制约着大学创新意识、创新人格、创新环境、创新体制的培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以知识继承为显著特征的教育模式更多强调的是对知识的记忆、模仿和重复性练习,其严重后果是难以催生创新型拔尖人才和大师级人物,最终必然导致科技创新能力和民族竞争力的低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不少大学关心的只是物质资源的多寡、教师队伍的强弱、历史基础的好坏、办学条件的优劣等等,对大学的创新文化则关心甚少。比如,我们的一些高校还缺乏必要的有利于创新的人文环境,对教师缺乏起码的信任,把教师置于管理的对立面,对教师劳动的评价充满功利色彩,缺乏宽容和允许失败的创新制度。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管得太多太细,抑制了青年学生的创新冲动和好奇心的培养。这些都说明,建设创新文化,开展创新教育是当前大学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紧要而长期的战略任务。

三、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影响激励

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是大学文化的两重属性。它们都是大学文化发展的性状和特征,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当前培育和建构大学文化、提升大学影响力的两个主要支点。大学文化的发展是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的统一。

1. 和谐文化是体现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创新文化,它是创新文化发展的目标。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不断积淀、凝炼和创造的文明成果。大学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和谐的文化并影响着师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某一时期的大学文化总是融汇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和谐统一。张维迎教授在分析大学何以基业长青的原因时,指出大学是一个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组织,大学有着优秀的组织文化。“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的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基本保持着稳定。大学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适应它的新的需求。”

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和谐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现象。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特征,因为和谐文化既来源于历史文化传统,又要符合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和谐文化都包含着某种先进性和创新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是创新的结果,创新文化是和谐文化的内容,和谐文化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目标就是推动大学文化不断趋于和谐。

2. 创新文化是和谐文化的源泉和动力,它推动和谐文化不断发展。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是对原有结果、状态或秩序的突破甚至否定。创新文化就是要突破常规和已知的文化,实现从阶段性的原序状态到新序状态、从低度和谐向高度和谐的转变。大学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文化,大学的发展归因于创新文化的推动。近代大学比之于中世纪的大学、现代





大学比之于近代大学都是大学文化创新和进步的体现。事实上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以及这些功能之间的和谐程度都是通过不断创新来完成和实现的。和谐文化建设离不开创新文化,先进理念的确立、科学发展的推动、管理制度的创新、利益关系的调整都需要创新文化的支持。大学只有不断培育创新意识,鼓励创新精神,培养创新人才,激发创造活力,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和谐局面。

大学创新文化的提出体现了新时期建设和谐大学的内在要求和文化自觉,它既是大学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紧迫的现实课题。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一要改革格式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专业设置,创新教育评价管理体制和教学内容、方法以适应创新素质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二要改革僵化的科技评价体制,努力营造和构建浓郁的创新氛围,着重培育和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成果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3. 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激励,不断产生一种新的和谐文化。创新是一种手段,和谐是一种目标。基于创新与和谐发展的大学文化是包含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的统一,创新求得和谐,和谐激励创新。在大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打破旧的和谐建立新的和谐,形成一种新的和谐文化。因此,培育和建设大学文化,不是只要创新不要和谐,追求创新是为了构建和谐;也不是只要和谐不要创新,构建和谐是为了鼓励进一步创新,二者不可偏颇。

大学和谐文化和创新文化的建设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继承中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正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无论是大学自身的发展还是社会对大学的要求都对大学文化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为此,大学必须努力建设创新文化,培育创新精神,激发创新潜质,构建创新机制,以实现大学组织自身内部的和谐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和谐。

作者: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李四平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22期

防止“近亲繁殖”武汉一高校招聘教师请校外专家把关

高校新进教师,多是由校方自己组织考核。近日,武科大中南分校出台一项新规:今后凡是新进教师,均需通过聘请的校外专家考核。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该校准备引进的一批硕士、博士,已进入试讲阶段。据悉,武科大中南分校新进教师均需通过笔试、面试和试讲三道关,并专门出台新规定:成立新进教师试讲考核小组,小组成员由学校教学督导室教授、学院专业教师、校外专家等三部分人员组成,每部分人员数2~3人。

改革探索

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新进教师试讲请校外专家参与,有利于学术评判标准更为多元化,避免以往校内教师评判标准相对单一,防止学术“近亲繁殖”。同时,这也能更好地保证考核的公平和公正。

作者:徐啸寒 朱建华 来源:楚天都市报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2日



高校 博览

高校青年教师博士化削弱本科教育

随着教师博士化成为高校的普遍要求,使得“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一台阶式的教师培养制度被打破,助教岗位严重空缺,对本科教育的质量形成较大影响。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 12 月 13 日在全校本科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上,提出了目前高校青年教师博士化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问题。

顾海良指出,现在高校引进教师一般都会要求其拥有博士学位。而一般博士毕业进入高校两年后就晋升为副教授,而晋升评定的标准主要以科研成果为主,而非教学质量,造成这部分教师在教学经验以及对教师责任感的理解上有所欠缺。

“中学教师还需要教师资格证书,大学老师却好像是人人可以无师自通。”顾海良说,目前主要是将学位制度评价和专业技术职称的评价相混淆。

现在的高校青年教师从小学念到博士,一直进行的是学术学习,并没有系统的教师教学学习和经验。按照大学教师职称制度,一个教师应该经历 3 年助教、5 年讲师才能晋升为副教授。现在这 8 年的助教、讲师阶段被 6 年的硕士、博士学习对冲,博士毕业任教两年就能当上副教授,教学方面每周上 2 到 3 堂课就能达到要求。

顾海良表示,高校青年教师的精力放在了科研评定职称上,这不利于提升本科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影响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顾海良说,武汉大学将尝试破除非博士毕业生不能留校任教的神话,将部分优秀硕士毕业生留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扎扎实实从事教学工作获得足够的教学经验和对教师责任感的体悟,来切实提升本科教育教学的质量。

作者:张先国 李鹏翔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07 年 12 月 14 日

毕业生求职有了“德育简历”如实记录获奖情况

北京物资学院 2008 年应届毕业生求职时,简历中会多一页学校盖章确认的“德育简历”,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奖励、社会实践经验甚至无偿献血次数都会如实记录,供用人单位参考。这是北京市首家为毕业生提供“德育简历”的高校。

从 2008 级入学的新生开始,“德育素质档案”将覆盖每一位北京物资学院的在读学生。如实记录学生在校四年的社会实践经历、参加讲座记录、无偿献血次数、志愿活动经历、担任学生干部情况、获得奖学金情况、报名参军等经历。德育素质档案由辅导员、班主任以及班级助理进行填写,每一项记录都会有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签字盖章。



该校应届毕业生现在就可以请学校提供“德育素质档案”，以丰富自己的求职简历。以往学生的求职简历中，只有成绩单由学校盖章确认。一些学生为了能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虚构获奖情况、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等，用人单位也无从核实。北京物资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德育简历有学校签字确认，更有公信力，也为用人单位核实学生情况提供便利。

作者：刘昊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8日

专家剖析大学流行语 校园里“寄托”“崩盘”另有涵义

一上课就想睡觉的学生被戏称为“特困生”；学生通过补课后成绩勉强过关被称为“软着陆”；用“寄托”代表GRE和托福考试……时下，大学校园的流行语形形色色。日前在上海中医大举行的上海高校心理咨询协会学术年会上，有关专家对此表示关注。

上海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家指出，大学校园流行语使用广泛，传播迅速，变化频繁，是校园文化内涵的重要表征之一。一些流行语显得另类，但也颇具知识性。例如“286”，借已被淘汰的计算机处理器来比喻行动迟缓、反应较慢的人；借股市用语“崩盘”指恋爱告吹；“BRB”是“be right back”之意，表示“很快回来”。校园海报栏里用“ing”或“ed”结尾的句子比比皆是，分别表示某些活动正在开展中、已经结束了。不少校园流行语具有谐趣性，如“名捕”比喻那些对考试作弊学生毫不留情的监考老师；“自大了一点儿”就是“臭”，因为“臭”的组成部分是“自、大、点儿”。

专家们认为，校园流行语的产生，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都可以找到相关成因。大学生较其他群体，对新生事物更加敏感，吸收力强，思维更具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因此大学校园成为许多流行语的“发源地”。同时，大学生在自我塑造独立人格的同时，也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受媒体影响，一些广告语言、小品台词、影视剧中的经典对白在校园传播，被学生赋予其他含义，成为一种语言时尚。如果有大学生不知道某句台词的典故和另类用法时，可能被视为落伍，例如春晚小品的一句“你太有才了”，一时间就成了校园里高频率用语。

制造校园流行语也成为大学生宣泄心理压力的一种途径。如，“郁闷”、“不爽”、“我晕”、“烦”之类的流行语，都是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的代名词。专家指出，此类用语在校园流行语中所占比例不小，反映了部分大学生中存在一种低迷的心理情绪。他们一方面期望拥有单纯、理想的大学生活，但是学习的紧张、人际关系的烦恼、就业压力的增大，以及部分学生因生活费拮据而烦恼等，都让大学生产生一定心理压力，寻找释放渠道。

专家指出，校园流行语中有形象生动、诙谐幽默的积极面，也有比较庸俗、消极、缺乏语言规范的负面影响。高校应在尊重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引导，充分发挥校园流行语的正面作用。专家建议，高校可通过开设中国语言文化选修课、讲座等，提高大学生语言使用素养；组织开展“精彩校园流行语竞赛”、“主题短信征集”、讨论不良流行语的危害等活动，鼓励学生用充满青春活力的语言来抒发美好情感，净化宿舍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同时，高校德育工作者应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适时适当地运用校园流行语，缩短与学生的心灵距离，引导学生提升校园流行语的文化品位。

作者：徐敏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7日





思想政治
教育专题

如何逐步形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如何组织和协调社会有关方面的力量，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合力”，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一个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局的重大课题。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整体合力正在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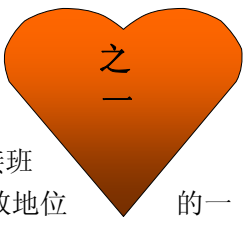
教育资源得到整合。在大力整合学校教育资源的同时，大力整合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源。把家庭作为大学生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堂，让家长当好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引导家长以自身良好的品行修养给子女做出表率，不仅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更重视培养子女的良好品德，为大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大力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充分运用科学理论、宣传舆论、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先进典型、大众传媒、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各类社会实践教育基地、祖国大好壮丽河山等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配合更加紧密。中央、地方、高校配合更加紧密，中央组织力量对部分省市和高校落实中央 16 号文件情况进行了督查，地方、高校进行了自查，总结了经验、查找了问题、促进了工作。部门之间配合更加紧密，按照目标任务分工，各级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加强统筹、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学校、家庭、社会配合更加紧密，发挥自身优势，调动各自力量，整体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良好环境逐步形成。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断满足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引导大学生奋发向上。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依法加强对学校周边文化、娱乐、商业经营活动的管理，严厉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维护学校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全面落实目标任务

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之一

的一



项重要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着力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任务进一步落到实处。全面落实中央16号文件的目标任务分工,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职能部门重要职责,纳入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建议中央和各省(市区)职能部门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和协调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大问题,部署工作任务,加强统筹协调,全面履行领导职责,有效实施组织领导。建议仿照公民道德宣传日的做法,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颁发之日,即每年的8月26日,定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日,届时由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有关职能部门举办系列宣传活动。建议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

积极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高校应发挥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真正做到统筹课内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统筹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统筹发挥党组织和学生组织作用,统筹思想政治教育三支队伍建设,统筹解决学生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有关部门应发挥好各自优势,主动履行应尽职责。教育主管部门,应按照中央要求,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三进”工作,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和教材体系建设,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加强师德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指导大学生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有效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应以主题教育为重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有关方面应相互配合,共同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宣传、理论、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应坚持弘扬主旋律,努力为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等方面,应进一步推进高雅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全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工商、司法、街道、社区等方面,应依法加强管理,坚决取缔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经营性娱乐活动场所,及时处理侵害学生合法权益、身心健康的事件和影响学校、社会稳定的事端,为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

切实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建设,努力形成教育整体合力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政策和相关制度,把建立教育机制互联、教育功能互补、教育力量互动和目标同向、教育同步、推进同力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纳入社会建设之中,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学校向家庭延伸、向社会拓展,真正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家庭教育为主托、以社会教育为主线的教育体系,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

作者: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13日



如何培养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深入研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形成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这个问题,特别是要研究如何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使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态势良好

政策不断完善。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教育部制定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普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和《2006-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计划》,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职责、选聘配备、培养培训、政策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推进了队伍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培训不断拓展。分级分类大规模地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初任培训、在职期间的岗位培训、晋升职称职务的任职培训、从事就业指导 and 心理健康教育等专项工作的专门业务培训。截至2007年7月,中央五部委在中央党校举办了14期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班,培训骨干教师1600余人;各省(区、市)举办了80余期研修班,培训学员8000余人。为了实施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新方案,中央和省市宣传、教育部门对近5万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了全员培训。教育部举办了11期全国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骨干培训班,培训2400余人;各地、各高校也整合培训资源,改进培训方式,积极开展辅导员、班主任培训。

但是,目前高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还存在不够到位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角色不到位、身份不明确,严重影响其发挥更大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对辅导员培训不到位、素质不达标,严重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一些地方和高校,没有像抓教师培训那样抓辅导员的培训,也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培训办法。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还没有纳入专业化视野,缺乏专业 and 学理支撑,处于有职业无专业、有岗位无学理的状态。同时,管理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也严重影响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有些高校没有把住选聘的“高进”关口,有些高校没有建设“优出”的立交桥,在实际工作中政策不到位、待遇不落实,严重影响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建设高水平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

一批好的教师会造就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会影响一批学生的未来。大学





生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键之一在于能不能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好,特别是把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好。

强化“双重身份”。按照教师和干部的双重标准,像做好业务骨干和干部的选拔那样做好辅导员和班主任的选拔,新聘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必须是中共党员,既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管理能力,又要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科专业背景、具有较强学术能力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班主任、辅导员,承担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更好地为大学生解疑释惑;鼓励专职辅导员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积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既用人格魅力又用学术魅力教育引导大学生。实现双向发展,多渠道输出。支持专职辅导员和班主任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成长为职业型专家;搭建辅导员和班主任流动“立交桥”,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意愿,及时输送优秀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到校内管理工作岗位任职,到地方、企业、社会组织等处发展。

开展“双重培训”。强化职业培训,把辅导员和班主任培训纳入学校师资培训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让其享受专任教师培养的同等待遇,确保任职期间上岗培训不低于40学时,日常培训不低于20学时,研修培训不低于80学时;坚持上岗培训和在职培训相结合、日常培训和专题培训相结合、中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相结合、国内培训与国外研修相结合,力争到2010年,完成在岗辅导员和班主任轮训工作,培养和造就1000名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一定国内影响的专家。加强专业培养,实施高校辅导员学位提升计划,力争在5年内分批选拔5000名优秀辅导员和班主任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500名优秀辅导员定向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鼓励和支持他们长期从事辅导员和班主任工作;有条件的高校还可设立辅导员和班主任专业,招收本科生或研究生,同时培养造就相关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等人才,做到专业培养、专业使用,彻底解决队伍难稳住的问题,努力建成一支以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为骨干的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

加强“双重领导”。加强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把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作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考核高校领导干部业绩的重要标准,建立党政“一把手”责任制,明确专人分管,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工作。加强院(系)组织的直接领导,把辅导员和班主任作为办学育人的重要队伍和依靠力量摆在重要位置,与专业教师同等对待;落实配置规定,落实培训规划,落实奖惩措施。

落实“双重待遇”。落实教师待遇,着力解决好职称评定、评选表彰、科研项目、津贴收入等问题。落实管理干部待遇,按照校内管理干部的做法,为专职辅导员确定相应的行政级别;把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作为党政后备干部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来源,选拔高校领导干部要重视辅导员和班主任的经历。

作者: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 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07年12月5日





美国高校德育的架构及其影响

摘要：尽管在多元的社会中，美国教育的内容是多元的，但不变的是坚持德育，既强调个人价值又强调社会价值。在德育的架构上，高校是主渠道，延伸到社会，校内外资源互补。借鉴国外经验必将增强我国高校德育的效果。

关键词：美国高校德育，架构，影响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高校为了使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非常重视德育，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一、美国高校校内德育的架构

美国高校的德育目的是传授健康的内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个思潮起伏不定的社会中，高校《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共存；个人至上和英雄主义共存；个人享乐和国家利益共存，政府和高校唯有正视现实、积极引导才是德育的最好出路。

1. 美国高校德育内容的架构

美国在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面对挑战强化了“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思想，在“9·11事件”后，既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又突出了好公民教育，展示了务实理性的德育观念。

美国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高校德育的内容，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等文献展示了实用的传统，高校关注的是提高大学生实用的素质：公民素质、职业素质、情感素质、思想素质、智力素质和体力素质等都渗透了德育的内容。公民素质方面要求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既发展自己又影响社会。职业素质方面要求学生为职业选择做好准备，正确认识工作职责，培养职业兴趣和技能。情感素质方面要求学生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有效控制情绪。思想素质方面要求学生顺应社会，克服自我中心倾向。智力素质方面要求学生保持求知欲望，发展创造能力。体力素质方面要求学生积极锻炼身体，克服不良习惯。

素质教育上首先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包括政治的和思想的教育，以提高学生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树立生活的信心，提高正确行为的自觉性、判断问题的准确性、社会实践的有效性。表面上大学德育很少讲政治，其实是隐蔽地进行的。大学生在前两年必须学好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西方思想史、美国现代文明、法律、哲学、经济等都是与政治相关的必修课，其他课程也都发挥着政治教育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是可选择的课程之一。为了注重实效，高校经常举行讲座，请教授、社会名人、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市民等介绍科技、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发展情况，激发大学生关心社会生活和国家大事。



人文素质教育上首先注重道德教育,做人比做事更重要(Learn to be first, Learn to do second),这是社会的共识。道德教育主要涉及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诚信意识等。人道主义教育上既突出个人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也突出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观念。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各类课程中。爱国主义和诚信意识是发扬传统和结合实际开展教育的切入点。了解美国的历史,培养领导世界的责任感,有利于激励大学生为保持美国的强大和世界秩序而工作。强调诚信意识是现实的需要,与经济发展相伴,急功近利使大学生考试作弊、剽窃论文、数据作假等现象时有出现,高校关注从小从早弥补大学生的诚信缺失。

2. 美国高校德育手段的架构

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又倡导信仰和言论自由,所以,高校需要运用多种手段来坚持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在社会洪流面前提倡个人与社会并重的价值观,使高校成为弘扬文明和阻止堕落的堡垒。

首先在制度上保证高校德育的进行。美国在法律权利观上奉行个人主义,在道德行为观上倾向于集体主义,这有利于高校结合法律和道德的因素,在行政层面上推进德育。通常教育统一对德育课程的开设提供支持,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组织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供学生、教师和家长使用。尽管在学分制下大多数课程的学习是非强制的,但是高校在行政上规定德育类课程为必修课,保证了学生这方面的学习。

在制度保障的同时,以隐性的、间接的、渗透式的方式向学生展开德育,避免直接讲授规则或者强迫灌输某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规定的课程,还是轻松的学术活动,其特点都是切合实际,灵活多样,入耳入脑,抽象的理论多是贯穿于生动的事实中展开的。利用其他学科的教学、各种学术活动来渗透德育是美国德育的特色,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的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于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是明显的,自然科学课程中蕴含的理智和情感因素给学生以理性的力量和宽广的心胸,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MBA案例教学法齐名的是德育类课程的专题讨论和团体活动。一般由师生共选专题,教师、专家、家长和学生一起讨论。有的教师注重焦点问题的辩论,通过两难事例的讨论,使学生展示见解,不求一致的结论。在实践环节上,重视团体活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制定计划和规则,组织和开展活动,特别要求学生相互关心,培养团队精神。

美国高校注意利用心理疏导来解决个别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学普遍开设了社会心理学课程,利用课外生存锻炼、实践性的演习、职业模拟训练等方式让学生学会自我调节,有效控制情绪,建立心理防线。心理咨询中心由心理学家、法律专家或社会学家担任咨询员,通过咨询服务和心理治疗,加强学生对集体的适应,树立竞争的信心,正确审视自己,客观评价他人。

二、美国高校德育在社会的延伸

高校是社会德育的主要阵地,社会是高校德育的实践舞台。大学生走出校门投身实践不仅可以影响社会,而且还可以利用社会资源接受教育。社会实践有利于学生了解社会,增强学习动力;增强自我管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增强意志力、探索力、自律精神和竞争精神;树立爱祖国、爱社会、服务他人的道德信念。





1. 利用社会活动启发心灵

大多数大学生乐于参加社会活动,无论是参加竞选、要求和平与反对战争等社会性活动,还是保护环境、扶贫济困和公益劳动等服务性活动,对学生的影响都是深刻的。为了保证活动的连续和实效,有的州通过了法案拨款支持。同时建立了跨学校、跨地区的联盟,指导、协调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

爱国主义教育是美国德育的主旋律,大学生可以在社会活动中身临其境地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如果说思想工作是为了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话,那么,爱国主义可以凝聚人心,找到在利益冲突中大家可以接受的结合点。爱好和信仰各不相同的大学生在爱国主义的熏陶下,可以感悟到:政党或政府是暂存的,国家是长存的,大学生是国家的主人,爱国是大学生切身利益所在。

宗教在美国奠定了道德的基础,维系社会交往,强化民族凝聚力,对大学生的行为颇有约束力。美国实行政教分离并不影响高校开设学术性的宗教课程,大学生可以自由信仰宗教。宗教表面上属于世界观,实际上是道德规范,基督教与人为善的“黄金律”与高校德育并不矛盾。高校对宗教的相对开放,使信仰宗教的学生可以自然地融入到社会中,用神的力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规范自己的道德操守。近年来,宗教采用现代形式,甚至科学理论来解释教义,更吸引了大学生信仰宗教。

2. 利用社会规范约束行为

经济和法律方面刚性的规范对大学生的行为是有效的他律。美国的学生接受12年的免费教育,升入大专院校后得到多种形式的奖学金,参加工作后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大学生利用社会资源追求成功,也要以劳动创造去奉献社会,社会有相应的经济规范要求大学生服务社会、感恩社会。美国的自由是以法制为保障的,社会把许多德育的内容纳入法制轨道,例如,不扫门前雪而使他人受伤、卖酒给21岁以下的青年、转录或出租黄色录像等,不属犯罪,但算违法,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对于大学生是有益的警示。

信用记录和志愿服务等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自律习惯。美国人都有一个终身不变的信用号码,工作、纳税、存贷、志愿服务、劳保救济、退休费发放、犯罪、交通事故、出入境等都与此联系。一有不良记录,求职、经营、消费就寸步难行,大学生都会珍惜自己的信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大学生参加过各种志愿者活动,进入著名高校的大学生都有义工的经历。《全国与社区服务法案》鼓励大学生继续服务社会,对于做满1400小时的大学生,政府每年奖励4725美元的学费,引导学生在正当利益的基础上行道德之事。

利用文化场所发挥育人功能是美国德育的优势。美国拥有各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公共文化场所,它们在德育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引导学生增长知识、接受美的熏陶、重新感悟人生、思考社会关系。美国不因历史短暂而放弃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做法,他们开发文化遗址、展示历史底蕴、利用社会资源,目的之一是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美国高校德育的影响

美国高校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德育工作经验,形成了一些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有效做法。这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的。

1. 美国高校德育的作用





有利于促进合格公民的培养。把爱国主义、法制观、价值观等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引导青年人积极向上、为国奋斗。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对青年的德育,并且影响着国民的基本素质。法制教育是最直接的政治性教育,不仅要在恐怖主义挑战的情况下确立美国的强权,并且要使大学生遵守公民的基本规范。价值观教育越来越突破实用主义的传统,倡导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生做一个奉献社会的好公民。

有利于引领国民精神和社会风气。美国高校的德育着力培养大学生爱国、守纪、诚信、乐观等公民素质,有利于大学生以自己的良好形象影响社会。大学生走上社会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人处事,强化了美国社会倡导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同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社会风气。

有利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造就人才。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美国高校的德育起点高、眼光远,不仅弘扬了传统,又紧跟了时代;不仅关注了本国问题,又关心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培养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技能全面的人才,而且有利于培养抱负远大、态度务实、勤奋刻苦的领军人才。

2. 美国高校德育的启示

研究美国高校德育,可以使我们改变以往西方不重视德育、唯有中国重视德育的看法,使我们以人为鉴,看到德育的重要作用,从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等方面培养能够应对国际环境挑战,适应改革开放的人才。

第一,正确理解德育首位的含义,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架构德育的内容。讲德育首位并不是说智育次位。德育首位在于:学校要承担德育功能,使德育贯穿于各门课程的教学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中。中国人口多,大学生的绝对数也多,更要突出德育为先的理念,脚踏实地开展德育工作。

第二,联系实际做好一、二项德育的基础工作。美国合格公民教育的启示在于,要把德育变成现实性和操作性较强的教育,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人生和道德的原理。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在于,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需要民族的根基,要看到自己辉煌的历史,更要看到发展的成就,提升民族自豪感,报效祖国。

第三,将灌输知识和培养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好德育工作。学生不会内心接受一般的灌输,培养道德习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求我们把受教育者置于平等的地位,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将德育渗透到社会和学校生活中,使道德思想和情感变成自觉的行动。

第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运用社会力量共同育人。现在众多大学新校区带来了周边经济的繁荣,社会反馈给学校的不应只是经济的影响。社会要配合学校整顿好校园环境,避免不良风气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学要利用本地资源,“走出去引进来”开展德育,更要立足学校建设优良的校园文化来熏陶学生。针对大学生自我中心的倾向,缺少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要联系家庭共同教育,使大学生在和谐的亲情友情中健康成长。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沈国桢 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12期

